



动荡与变革

复旦国际战略报告

2023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
2024年1月

目 录

序 言	1
1、变乱交织：2023 年的国际政治	3
2、韧性与变数：2023 年世界经济	9
3、2023 年中国外交：塑造外部环境，推动世界和平	14
4、美国：内斗外患，对华缓和	20
5、战争延宕下的俄罗斯时局	26
6、2023 年欧洲对华政策：暖中有寒	34
7、中日关系：再确认与再出发	41
8、印度：积极作为的一年	47
9、螺旋下降的东北亚与朝鲜半岛	53
10、总体向好、局部震荡的中国 - 东盟关系	62
11、相互依存、提质升级的中国 - 中东关系	67
12、非洲战略自主性提升的可持续性挑战	73
13、拉美地区：政经困局犹存，对华合作提升	79
14、俄乌冲突又一年：僵局与出路	84
15、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影响与前景	89

序 言

2023年，世界经历重大动荡与变革。

动荡与冲突是2023年国际局势的突出特征。俄乌冲突未止，巴以冲突再起。全球冲突的数量、强度和持续时间都达到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高水平。2024年，旧的冲突不可能完全平息，新的地缘政治冲突还会发生，一些国家内部的冲突也会产生显著的外部效应。与此同时，战略上的大国竞争与地缘政治角逐，经济上的民族主义与保护主义，社会政治上的民粹主义与极右思潮等将相互激荡，从而加剧世界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

变革是国际局势演变的另一特征。随着多极化进程的加快，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在重构。全球南方的崛起、金砖机制历史性的扩容、中东宿敌沙特与伊朗的和解等等，给晦暗的国际政治带来新气象。技术进步也是变革的重要推手，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深刻地改变人类的工作与生活方式，也会重塑国际政经格局。

2023年，中国外交再出发。中国以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支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不遗余力促进和平、助力发展、倡导合作、推动和解。当今世界，有的大国执迷于过去的荣耀，有的沉醉于现状的舒适，中国则竭力打造更好的未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变革之势不可阻挡，唯有顺应和引领，才是时代的弄潮儿。

2024 年，期待中国外交更加亮丽的表现。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1、变乱交织：2023 年的国际政治

信 强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副主任

在 2023 年，全球各国不仅见证了惨烈的俄乌战争的延续，而且目睹了又一场血腥冲突——“巴以冲突”的爆发，两场军事冲突彰显了当前国际体系所蕴含的巨大风险和不确定性。与此同时，大国战略博弈的强化、部分大国关系的有限调整、“全球南方”的崛起、全球治理的艰难推进等，均对地区乃至全球政治、经济、外交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2023 年国际政治之乱

2023 年可谓国际政治纷争和军事冲突多点爆发的一年。首先，俄乌战争已然进入第二年，双方在战场攻防态势上总体陷入了僵持局面。在得到美西方巨额经济援助和大量先进武器的支持后，乌克兰在夏季发起了“扎波罗热大反攻”行动，但是却没能取得预期的结果，甚至无法有效突破俄军的防线，从而被迫自 10 月下旬开始从进攻转入防御态势。而俄罗斯则在 6 月发生了由瓦格纳雇佣兵集团首领普利戈津发动的“兵变”闹剧，但是俄军凭借坚固的工事防守，依然抵挡住了乌军的反攻行动，俄乌战事再次陷入互有攻守的胶着状态。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对于持续的俄乌冲突，美西方在 2023 年已然对于维持对乌援助显露疲态，尤其是作为援乌主力军和领头羊的美国，虽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于 12 月 11 日专程赴美寻求援助，但是由于美国府会权争以及两党恶斗，加之民众对援乌的支持率持续下滑，

泽连斯基此行仅仅得到 2 亿美元的美援，远远低于 600 亿美元的预期目标，而欧盟也因成员国难以达成一致，未能通过价值 500 亿欧元的对乌援助资金，从而势必会对乌克兰的持久作战能力造成严重影响。

其次，10 月 7 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起代号为“阿克萨洪水”的军事行动，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数千枚火箭弹，以色列随即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发动代号“铁剑”的打击行动，并突入加沙地区展开地面进攻。截至 2023 年底，双方已有近 2 万人死亡，加之加沙地带学校、医院、住宅和难民营频繁遭到轰炸，甚至有 130 余名联合国工作人员也因以军轰炸而殒命，大量平民的伤亡使得加沙陷入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目前为止，哈马斯与以色列还没有达成包括人道主义停火在内的任何协议，停火谈判也陷入僵局，且存在着冲突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

此外，惨烈血腥的巴以冲突也点燃了中东地区积累已久的宗教、民族、教派矛盾和宿怨，部分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和解进程陷入停滞，例如沙特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谈判便已戛然而止。更为严重的是，冲突所产生的“蝴蝶效应”影响正在快速突破地区范围，战火已经逐渐蔓延至周边国家，例如以军空袭了叙利亚大马士革机场与阿勒颇机场，使得两个机场陷入瘫痪。又如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拉克的武装组织正在越来越深地介入巴以冲突，频频与以军发生交火。也门胡塞武装则不断对商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对繁忙的红海商业航运形成了巨大威胁，作为全球航运“动脉”的苏伊士运河面临“关闭”的风险，而美国则开始联合多国组建护航舰队，巴以冲突扩大化为区域冲突的风险正在逐步上升。

第三，在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之外，全球多个国家发生内乱甚至内战，国家间流血冲突也屡见不鲜，包括 2023 年 9 月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国在纳卡地区发生的军事冲突，以及 10 月缅甸政府军与果敢、

德昂、若开军之间在缅北地区爆发的内战。多年来饱受战火蹂躏以及恐怖主义、种族仇杀荼毒的非洲多国也在 2023 年陷入新的动荡，其中尤以从大西洋之滨延伸到非洲之角，横跨塞内加尔、马里、尼日尔、乍得、苏丹等 10 余国的“萨赫勒地带”为甚。4 月 15 日，苏丹再次爆发内战，造成上千人伤亡，以及数百万人流离失所。7 月 26 日，尼日尔发生武装政变并解除该国总统的职务，随即由军政府接管国家事务。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布基纳法索、马里等国的内乱也始终无法得到平息。

第四，频发的地缘政治冲突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造成了严重扰乱，能源、粮食价格普遍出现上涨，使得大量最不发达国家民众的基本生存面临着严峻挑战。例如在全球大米贸易中占比约 40% 的印度多年来一直是世界第一大米出口国，而在 7 月 20 日，印度突然宣布禁止除蒸谷米和印度香米外的大米出口，对全球粮食市场投下一枚震撼弹。阿联酋和俄罗斯也随即于 28 日和 29 日出台类似的出口限制禁令，导致全球米价飙升，粮食安全成为全球安全的重大隐患。又如，由于能源出口大国俄罗斯面临严厉制裁，而中东以沙特为首的产油国则不顾美国的反对于 8 月宣布石油减产，使得世界原油价格维持上涨，并带动其他大宗商品价格随之上涨，使得本就复苏乏力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

二、2023 年国际政治之变

面对不断升温的国际政治争端甚至大规模武装冲突的爆发，全球各国开始逐步作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以适应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进而使得大国战略博弈、地区乃至全球权力格局的重组、国际秩序的转型均出现一系列新的动向。

首先，就大国关系而言，中美两国关系在经历一系列负面冲击之后，终于随着两国元首 11 月在旧金山举行会谈而得到了一个“止跌回稳”的缓和机会，两国在打击毒品犯罪、气候变化、人文交流等领域的合作有望逐步得到恢复。中欧、中日、中印关系虽然龃龉不断，但是也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之下相继出现不同程度的回暖迹象。与之相对，美西方不断加码的对俄制裁以及持续的俄乌冲突，导致俄罗斯与美西方国家的关系依然冰封雪裹。2 月，俄罗斯决定暂停参与美俄之间最后一项军控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11 月 2 日，俄罗斯撤销对《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批准，又在一周之后宣布完成退出 1990 年签署的《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程序，美国和北约也随即跟进宣布暂停参与，标志着又一个冷战时期的里程碑式军控协议消亡，也使得美欧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与此同时，积极“向东看”的俄罗斯则着力加强与中国的战略合作，两国空军两度举行联合战略巡航，双边贸易有望突破 2000 亿美元大关，且基本实现完全以本币结算，中俄友好合作关系达到了历史高点。此外，作为代表性新兴大国之一，印度虽然受到美西方的积极拉拢，美印关系也在莫迪 6 月访美期间宣称进入“新时代”，并在国防、科技各领域签署多项合作协议，但是此后却因印度特工被曝光在美、加暗杀锡克教领袖事件而引发严重的外交争端，印度转而有意拉开了与美西方的差距，并持续加强与俄罗斯的安全与能源合作。

其次，面对美西方所主导的国际体系，诸多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展现出更为团结的姿态，开始积极增强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制衡发达国家的政治和经济霸凌行为，使得“全球南方”的崛起成为 2023 年国际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推动着世界进一步向多极化的方向发展。例如随着 2023 年 7 月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成为第 9 个成员国，上合组织的国际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又如在 8 月南非约翰内斯堡

金砖峰会上，金砖组织时隔 12 年首次实现扩容，吸纳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五个新成员，使得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从 5 国扩容至 10 国（阿根廷新政府于 2023 年 12 月 30 日宣布放弃加入金砖机制），未来势必会在推进可持续发展，加强包容性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再如随着加沙地带平民伤亡的急剧攀升，联合国大会不顾美国的阻挠和反对，于 12 月 12 日以 153 票赞成、10 票反对的压倒性多数结果通过决议，要求立即在加沙地带实现人道主义停火，展示出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美以两国所作所为的不满与谴责。

第三，多边合作与全球治理虽因大国博弈的加剧与地缘政治冲突的升温而变得举步维艰，但是依然在 2023 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尤其是在最受世人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上，于阿联酋迪拜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8 次缔约方大会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尽管各国针对应该“逐渐淘汰”还是“逐步减少”化石能源存在着分歧，但是最终 198 个缔约方的代表仍然达成了历史性“阿联酋共识”，首度一致同意将从化石能源转型，并通过了全球适应目标框架和公正转型路径工作方案，呼吁世界各国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从而将全球升温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的 1.5 摄氏度以内，展现了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意愿，为下一步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指明了方向，也为艰难前行的全球治理带来了难得的一抹亮色。

三、结语

变乱交织、冲突频发的 2023 年已然过去，但是 2024 年全球可能会面对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战略风险。例如就俄乌冲突而言，由于俄乌在谈判条件、和平愿景等方面存在根本性分歧，加之虽然美欧最新援乌计划相继搁浅，但是美西方还将继续为乌克兰提供必要的军事和经

济援助，加之欧盟又于12月14日同意启动乌克兰入盟谈判，可谓是给乌克兰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因此俄乌双方谈判前景依然渺茫，短期内难以看到恢复和平的曙光。再就巴以冲突而言，虽然以色列面临着日益增大的实现停火的国际压力，但是企望业已杀红了眼的冲突各方同意停火殊非易事，冲突引发的仇恨与对立更是不可能轻易消散，其对中东地缘战略格局的扰动也必将不断发酵。

此外，随着包括美、俄、印、印尼在内的全球70多个国家、约42亿人口将在2024年迎来选举季，其中所蕴含着的不确定性有可能令全球继续面对政策摇摆、动荡频仍的一年。回望2023年，便已有意大利、荷兰、瑞典、阿根廷等多国迎来了极端民粹政客的上台执政。各国选举的进程和结果势必会对其内政外交政策产生重大的影响，搅动世界风云的变幻，包括大国之间战略博弈的升级或降温，以及全球政治、经济、贸易、外交格局的重塑和调整。作为“超级选举年”的2024，注定将不会是一个平静无奇的年度。

2、韧性 & 变数：2023 年世界经济

宋国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2023 年是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均走出疫情的第一年。在摆脱疫情冲击后，世界经济朝向正常化迈出重要一步。从 2023 年的表现看，世界经济表现出了强大的韧性，能够维持稳定发展态势，但面临挑战仍然较多，复苏乏力，未能真正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一、2023 年世界经济表现特征

低增长。2023 年世界经济虽然打破了硬着陆的风险，但增速较低。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世界经济增速约为 3%，低于 2022 年 3.5% 的全球经济增速。这主要由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所导致。与 2022 年的 2.6% 相比，发达经济体 2023 年经济增速为 1.5%。尽管美国经济增速和 2022 年大致持平，但欧洲国家经济大幅下降。欧元区经济增速从 3.3% 继续下滑至 0.7%。其中德国经济更是出现了负增长，这也是所有主要经济体中唯一负增长的国家。英国经济增速也从 4.1% 下降至 0.5% 左右。这表明，俄乌冲突的地缘经济效果正在持续作用。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为 4%，与 2022 年基本一致。

中通胀。2022 年的高通胀延续到了 2023 年，大部分的经济体依然把抗击通胀作为经济的首要任务。与 2022 年相比，今年全球控制通胀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全球通货膨胀率从 2022 年的 8.9% 回落至 2023 年的 6.9%。发达经济体的控通胀更有成效，通胀率 7.3% 下降至 4.6%。这主要得益于美国通胀率的快速下降。最新的数据显示，美国

消费者指数已经从去年年底的 6.5% 下降至今年 11 月份的 2%。促使美国通胀回落的政策原因在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2023 年，美联储今年前三次会议持续加息，释放了严厉的控通胀信号，也产生了积极效果。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通胀率依然保持在高位，从 2022 年的 9.8% 缓慢下滑至 8.5%。部分国家，如阿根廷和土耳其等，通胀近乎失控。

高债务。由于世界经济复苏基础尚不牢固，2023 年各国继续用债务扩张以换取经济增长，这成为非常时期的必要选择。世界经济还在高债务中前行。美国 2023 年进一步扩大债务规模，一年之内联邦债务增加约 2 万亿美元，其联邦债务总额也不断打破历史纪录。中国总体债务规模可控，但 2023 年财政赤字率也突破年初设定的 3%，以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上升至 3.8%，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高水平。如何化解债务成为各经济体当下和未来必须面临的严峻考验。

弱治理。尽管世界经济面临各种挑战，亟需各经济体通过共同治理的方式寻找协调应对之策，但从 2023 年的情况看，全球经济治理表现出较为显著的“弱治理”特征。二十国集团未能凝聚共识，在应对全球各种经济挑战中发挥中坚作用。G20 印度峰会成果较为有限，无法最大限度地团结广大成员。欧美等西方国家从地缘冲突和大国竞争出发，愈发把非经济因素纳入全球治理中，干扰了治理的经济属性。

“全球南方”作为新兴力量，在全球经济治理中作用凸显，进一步发出与“全球北方”不一样的声音。“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在发展议程、气候变化和债务减免等议题上分歧加剧。

中美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为全球经济增长发挥了关键作用，贡献了全球经济增长的一半以上。两国经济表现有喜有忧。对中国而言，喜在全年经济运行保持平稳，主要预期目标总体达成，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忧在社会预期偏弱、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等。对美国而言，最大的喜是在控制通胀上升势头的同时，能够实现超出

预期的经济增长速度。相较于之前的预估而言，美国经济在所有大型经济体中，超预期程度最为突出。这也使得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稳中有升。忧在通胀尚未根本控制，经济复苏仍然羸弱，货币政策依然面临困难抉择。

二、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

从 2023 年看，世界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增多，既有经济政策因素，也有地缘政治因素。部分因素不仅在当年发挥作用，而且会塑造未来世界经济发展。

经济政策主要体现在产业政策和货币政策两个方面。其一，产业政策回归。美国正式推出“新华盛顿共识”，决意更为有力地发挥政府作用，强化工业基础，增进美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围绕着产业政策实施，美国政府在贸易政策、税收政策、能源政策和投资政策领域加以配套。随着美国重视产业政策，全球经济体在产业领域竞争会加剧。特别是国家安全相关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大国间竞争会更为明显。全球产业分工和布局都将面临一定调整。其二，货币政策转向。从货币政策角度，2023 年实际上可以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大致为上半年，各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紧”字当头。但到了下半年，货币政策则以“稳”字为主。各经济体纷纷停止加息，力图结合相对和缓的通货膨胀，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助力经济增长。

地缘政治因素则有以下三点。其一是俄乌冲突地缘经济影响。世界经济用一年多的时间基本消化了俄乌冲突的全球经济影响，比如能源、农产品等价格上涨和供应链短期中断。但从地缘看，俄乌冲突对欧洲的影响仍在持续。欧洲 2023 年经济表现不佳，与其比其他区域更遭受俄乌冲突所带来的经济风险高度相关。其二为大国竞争地缘经

济后果。美国和欧盟放弃了一度曾主张的对华“脱钩断链”，转而强调对华“去风险”。但不管名称如何变化，其在全球范围内重置生产链、供应链的战略继续推进。全球供应链碎片化和区域化特征显著。其三是全球投资地缘流向。从2023年的全球投资分布看，跨国资本聚集于美国的“友岸”和“近岸”态势有所增加。一些经济体，兼具地缘和政治上的双重优势，吸引更多国际投资，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持续上升。具体而言，越南、墨西哥和印度等国家相对受益。

三、世界经济发展的变数

在不确定性的时代，世界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变数。从2023年的情况下，以下三点尤为突出。

变数之一是货币政策及其效果。虽然从全球货币政策趋势看，特别是12月份美联储的表态看，2024年很可能会迎来降息周期。这也意味着从3年前开始的全球加息周期终结。理论上，降息有助于经济增长。但从预测看，全球经济和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并不可能，而且还可能出现弱增长甚至是浅衰退的情况。全球降息和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相伴相随。更为重要的是，和加息一样，美国主要以其自身经济状况制定货币政策，与其他经济体存在严重差异。在其他国家并不清楚美国何时降息以及降息幅度如何的情况下，就不得不直面美国的降息周期。其中存在巨大金融风险。

变数之二是债务水平及其影响。全球债务规模仍将增加，短期内难以看到债务规模下降。适当举债并无不当，但显然，现在全球经济已经产生了债务依赖症。尤其是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债务高企，一碰到经济问题，习惯性地通过扩大债务加以应对。在不存在刚性债务限制的情况下，全球债务将不断累积。如此多的债务势必会带来利息支

出增加，挤占财政支出，危害财政健康，损害经济增长。但债务边界到底在哪？这并无定论。各国增加债务恐怕仍是大的趋势。无论如何，如此庞大的全球债务如何化解，将始终是世界经济面临的重大难题。

变数之三是碎片程度及其演化。全球化很难回到之前。在政治和安全冲击之下，全球经济碎片化程度上升，这在贸易领域已有表现。碎片化有三种发展可能。一是有限碎片化。全球产业链温和变迁，中美经济依然挂钩。二是中度碎片化。全球产业链快速转移，中美经贸高度脱钩。三是高度碎片化。中美互不依存，形成两大平行且对抗的经济体系。现在正处于有限碎片化的阶段。尽管演化成高度碎片化的概率不大，但并非不可能。特别是美国 2024 年总统大选结果选出一位孤立主义思维、对华竞争对抗的总统，全球碎片化趋势将会加剧。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若世界经济完全分裂成两个集团，全球 GDP 可能会产生多达 7% 的损失。如何通过大国协调控制经济碎片化程度，是世界经济必须解决的问题。

3、2023 年中国外交：塑造外部环境，推动世界和平

林民旺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2023 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开局之年。中国外交秉持“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精神，开展四场主场外交，召开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首届中国－中亚峰会，成功举办成都大运会、杭州亚运会。与此同时，借着国内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积极开启了大交流、大交往、大合作的局面，改善并塑造了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后，中国又提出了全球文明倡议，丰富并完善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卓有成效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中国为动荡的世界注入了稳定性，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了中国贡献。

一、构建稳定、均衡的大国关系

2023 年中国通过积极运筹大国关系，实现了年初在莫斯科举行中俄元首会晤，年底在旧金山举行中美元首会晤，推进了大国协调合作，构建出了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

2022 年 11 月，中美两国元首在巴厘岛举行会晤，达成了推动两国重回健康稳定发展正轨的共识。然而，一场意外的无人飞艇事件破坏了整个进程。美方不顾中方的解释，执意动用武力袭击中国企业的民用无人飞艇。3 月初，习近平主席直接点名批评美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实施了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给我发展带

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美方随后开始加大释放善意，加快两国高层的互动访问，最终实现了11月中美两国元首的旧金山会晤。双方取得二十多项重要成果，恢复了一系列对话、沟通交流机制，缓和了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大氛围。

俄罗斯是中国背靠背的战略协作伙伴。在美国对中俄同时搞“双遏制”战略的背景下，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更强的动力。3月，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10月普京总统来北京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两国元首间的高度互信，为中俄战略关系提供了战略引领和政治保障。不过，两国也明确表示，两国关系不是军事政治同盟，具有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性质。中俄两军在2023年内按照安排举行了一系列联合军事演习，中俄经贸合作更是得到了强劲发展，两国贸易额历史性地首次突破了2000亿美元。

中欧高层交往继续在2023年保持良好势头，法国、德国、西班牙、希腊欧洲各国领导人纷纷访华。4月，习近平主席同法国总统马克龙、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举行中法欧三方会晤。6月，国务院总理李强访问德国、法国，并分别举行第七轮中德政府磋商并出席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12月，第二十四次中国-欧盟领导人会晤在北京顺利举行。

中欧关系既有积极进展，也存在不少隐忧。4月，法国总统马克龙率领庞大的商务代表团访华时，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他还明确告诫欧洲要坚持战略自主，不要在台湾等问题上完全追随美国的立场。7月，德国首次发布了对华战略文件，显示出德国国内在对华政策上的摇摆。9月，德国企业巴斯夫在中国签下百亿级新项目的同时，欧盟却对华发起了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在冯德莱恩提出对华“去风险”政策后，欧盟计划未来对中国很多产业都要进行反补贴调查，意大利也宣布退出“一带一路”倡议，而俄乌冲突仍然影响

并制约着中国与很多中东欧国家之间的合作。

二、塑造战略环境、扩大朋友圈

良好的战略环境是中国和平发展的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拜登政府在《印太战略》报告中明确提出“美国要塑造中国所处的战略环境”。2023年是中国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提出10周年，中国积极主动地塑造周边战略环境和全球环境，取得了积极的进展。

一是改善或部分修复了同美国盟友澳大利亚、日本的关系。新冠疫情暴发以来，日本和澳大利亚奉行完全追随美国的政策，导致中日、中澳关系大幅下跌。随着两国政府政权更替，对华关系出现积极趋向。11月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实现访华，这是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领导人的首次访华。中澳关系逐渐回暖，经贸关系逐渐恢复。日本由于坚持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中国不得不全面暂停进口日本水产品，中日的分歧加剧，但是双方都愿意继续保持高层沟通，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旧金山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推动两国关系重回发展轨道。在此背景下，2023年11月26日外交部长王毅在韩国釜山同韩国外长朴振、日本外相上川阳子共同出席第十次中日韩外长会。三方同意要为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创造条件，加紧相关筹备工作。这是时隔四年后，中日韩外长会的再次启动。

二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关系实现提档升级。5月18日至19日，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在西安举行首届中国-中亚峰会，签署了《中国-中亚峰会西安宣言》。这次峰会形成54项主要合作共识和倡议，以及19项拟成立的多边合作平台，达成9项峰会框架内的多边合作文件。可以说，中国-中亚峰会实现了中国与中亚关系的提档升级，强化中国中亚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未来中国－中亚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

三是应对好周边国家政权更换，持续巩固对华友谊。8月，柬埔寨人民党赢得柬大选，洪玛奈成为柬埔寨新一任首相。9月14日至16日，洪玛奈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其担任首相后的首次出访，凸显出柬埔寨新政府的外交取向。在访华中，洪玛奈承诺，柬新一届政府将继续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新加坡即将要在2024年进行大选，新加坡现任总理李显龙早就声称将交棒给副总理黄循财，将其确立为新加坡第四代领导团队的领军人物。在此背景下，12月黄循财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访问，为未来的中新关系发展奠定基础。习近平主席于12月12日至13日对越南的国事访问，确定了中越两党两国关系的新定位，提出了构建中越命运共同体。这标志着中国同中南半岛国家在双边和澜湄合作多边层面实现了命运共同体建设全覆盖。

四，扩大中国的国际朋友圈。在2022年9月的撒马尔罕峰会上，上合组织迎来了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员。金砖国家合作在2023年迎来了大规模扩员。在8月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议上，金砖国家宣布邀请沙特、埃及、阿联酋、阿根廷、伊朗、埃塞俄比亚正式成为金砖大家庭成员。这是金砖合作最大规模的一次扩员，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彰显了金砖国家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给金砖合作机制注入新的活力。而中国在此次金砖扩员进程中所扮演的关键的主要作用，更是凸显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三、化解国家间矛盾，推动世界和平

一直以来，中国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如伊朗核、阿富汗、朝鲜半岛等问题，都主张推进以对话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俄乌冲突爆发

以来，中国积极劝和促谈的立场，曾受到不少国家的质疑。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中国的立场和做法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2023年，中国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提出并推动一系列方案来推动国家间矛盾化解，促进世界和平。

一是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呼吁停止战火，启动和平谈判。这一立场文件总结了过去一年多中国就乌克兰危机所形成的完整立场，同时吸纳了各方合理关切，秉持着客观中立的立场，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认同。虽然美欧国家对这一文件整体上持批评态度，但是理性的国家都认为文件本身是具有建设性的，俄罗斯、法国、联合国都予以肯定。乌克兰方面对中方意在推动停火止战的努力也予以赞赏。4月26日，习近平主席与泽连斯基总统首次通电话沟通。随后中国派出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访问多国，就俄乌战争进行周旋，致力于推动中方提出的乌克兰和平计划。尽管目前尚未见成效，但是中国的立场为更多国家所理解，中国致力和平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

二是在中国香港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备办公室，致力于建立世界上首个专门以调解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政府间国际法律组织。随着国际社会对调解的需求日益增加，中国与持相近理念的国家决定共同发起建立国际调解院，专门提供调解服务，致力于以和平方式处理分歧，以对话协商解决争端，以互利互惠摒弃零和博弈，为各类国际争端提供友好、灵活、经济、便捷的解决方案。2月16日，印尼、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塞尔维亚、白俄罗斯、苏丹、阿尔及利亚、吉布提等《关于建立国际调解院的联合声明》签署国参加了筹备办公室成立会议。

三是，中国斡旋沙特伊朗复交并实现关系正常化。3月，沙特和伊朗代表团在中国的斡旋下举行会谈。会后，三国宣布，沙特和伊朗将逐步恢复外交关系、重开使馆、互派大使，并加强双边关系。在中

国的外交斡旋下，中断外交联系七年的沙特和伊朗走向了和解。中国的这一外交努力得到中东乃至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和称赞，凸显了中国作为公平公正、值得信任的负责任大国的角色。

在巴以冲突爆发之后，中国明确阐明中国立场，强调应该立即停火止战，防止冲突扩大。同时提出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11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巴以问题特别视频峰会并发表题为《推动停火止战、实现持久和平安全》的重要讲话。11月30日中国发表了《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更加系统地阐明了中国的主张。

总而言之，2023年的中国外交，在复杂动荡的外部环境下积极进取，继续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同时也着眼长远，适时改善同周边国家关系，提升优化了战略的全球布局。

展望2024年，世界仍将不太平。不少大国都要在2024年进行大选，中国周边的关键国家也是如此。对中国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此背景下，中国外交相信会继续积极进取，谱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

4、美国：内斗外患，对华缓和

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2023年，是美国遭遇内斗与外患的一年。一方面，共和党利用控制的国会众议院叫板拜登政府，同时共和党内也展开激烈博弈，政治双重极化特征突出；另一方面，俄乌冲突并未朝着美国所期待的方向发展，巴以冲突的激烈爆发更是让美国措手不及，对以色列战争行为的无条件支持令拜登政府在国内外饱受批评，美国国际声誉严重受损。当2023年的日历翻过最后一页之际，拜登聊可自慰的是，美国经济增长超出预期，通胀持续回落，就业数据看好，中美关系有所缓和。

内斗加剧

2023年，美国国内政治主要受到三大因素的影响，一是中期选举后的权力结构变化，二是2024年大选的前置效应，三是共和党内的分化。

首先，共和党利用其控制的国会众议院牵制拜登政府，这突出表现在双方围绕提高“债务上限”和联邦预算的斗争上。2023年1月19日，美国触及31.4万亿美元的债务上限，财政部随后采取“非常规措施”避免债务违约。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屡次警告，国会须及时采取行动，否则相关措施到6月5日将用尽。共和党人坚持以削减政府开支为同意提高债务上限的条件，起初未获民主党人接受；拜登政府试图推动征收“富豪税”以增加政府收入，又遭共和党人强烈抵制。经过数月的激烈博弈，最后一刻双方达成妥协，避免了债务违约。接着，

美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围绕2024财年联邦预算拨款法案又展开了争斗。共和党反对援助乌克兰，要求加强边境管控，而民主党反对削减开支，双方僵持不下，几乎导致政府关门，最后才在9月30日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由于这项临时拨款只能维持到11月中旬的政府开支，于是两党又不得不再次博弈，在11月17日政府关门的前几天再次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两党斗争使得美国联邦政府只能持续在关门的阴影下运转。

其次，两党围绕2024年大选展开的博弈。由于特朗普早在2022年11月中期选举之后就宣布要再度竞选总统，且其民调显示的支持率远远超过其他共和党候选人，因此狙击特朗普就成为民主党的主要任务。2023年3月，特朗普被纽约检察官以涉嫌向艳星支付封口费，并伪造财务记录等罪名起诉。6月，特朗普因涉嫌不当处置机密文件面临联邦特别检察官的37项刑事指控。8月，特朗普因涉嫌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选举结果遭到刑事起诉。12月19日，美国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因牵涉2021年1月6日“国会山骚乱”，特朗普在该州不具备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党内初选资格。12月29日，缅因州州务卿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共和党发起反击，剑指已宣布竞选连任的拜登。12月13日，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投票通过一项表决，决定对总统拜登展开正式弹劾调查。调查的内容是拜登是否从他的儿子亨特·拜登的海外商业交易中不当获益。围绕2024年大选的博弈正在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展开。

最后，共和党的内部分化也在2023年演出两场大戏。一是在年初，由于占众院多数的共和党人内部分歧严重，使得众议院议长难产，在经历长达4天总共15轮投票之后，麦卡锡才得以当选第118届美国众议院议长，这使得麦卡锡成为一百余年以来首位经历15轮投票才当选的议长。二是在10月3日，因麦卡锡在批准临时拨款法案问题

上与民主党合作，经共和党议员马特·盖茨提议，众议院投票罢免了麦卡锡。麦卡锡在职仅269天，是美国历史上任期第三短的众议院议长。这也是美国政治史上首次有议长遭到罢免。麦卡锡议长一职的难产和短命，反映的是共和党内传统右翼与新兴的极右翼之间的深刻分歧，暴露了共和党内部的严重极化趋势。

外患堪忧

2023年，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是拜登政府面临的两大挑战，它牵制了美国的对外战略，消耗了美国的资源，也使美国的国际形象严重受损。

2023年，尽管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大力向乌克兰提供支持，但俄乌冲突并未出现美国所期待的结果。乌克兰从夏季开始发动的反攻仅收复了南部和东部的几座城市，未能取得重大进展，战事陷入僵局。乌克兰高层显现分歧，总统泽连斯基与乌军最高指挥官扎卢日内之间出现矛盾。在此情况下，美欧都出现援乌疲劳症。美国方面，由于共和党议员坚持把对乌军援与改革美国边境安全政策进行“绑定”，拜登提出的610亿美元援乌法案被共和党延宕，泽连斯基为推动美国追加对乌援助临时赴华盛顿游说，仅拿到区区2.5亿美元。欧洲方面，匈牙利也否决了欧盟500亿欧元的援乌计划。2023年，乌克兰在战场上面临的不利态势和美欧援乌的不力，不仅反映出美国对俄乌冲突走向的战略误判，也削弱了美欧对外承诺的可信度。

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代号为“阿克萨洪水”的军事行动，造成以方千余人伤亡，以色列发起反击，对加沙地带展开所谓“铁剑行动”。到12月底，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已造成两万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多

数是妇女和儿童，一百多名联合国雇员也丧生在以军炮火之下。加沙几乎被夷为平地，几乎所有人都流离失所。面对以军在加沙制造的巨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国际社会强烈谴责，敦促以色列停火。然而，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两次否决了呼吁停火的决议案，并向以色列提供大量军事支持，包括向中东派出两艘航母。

巴以冲突的爆发给美国带来了一系列冲击。首先，它使美国中东政策严重受挫。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华盛顿试图推动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改善关系，将巴勒斯坦问题边缘化。巴以冲突使得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进程中断，巴勒斯坦问题再次突出。其次，美国因其严重偏袒以色列的政策而在国际社会陷入空前孤立。联合国安理会在10月18日和12月8日两次表决巴以人道主义停火决议案，美国是唯一投反对票的国家。12月12日，联合国大会以153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巴以停火决议案，美国、以色列等10国反对，英国、德国、乌克兰等23国弃权。美国的孤立可见一斑。第三，美国在此次巴以冲突上的所作所为显示了其对公认的国际规则与规范的无视，暴露了美国外交道义的虚伪性，这对其国际信用的负面影响将是长期的。

中美缓和

2023年的中美关系，主要有如下特点。一是双方的博弈更加激烈。美国挑起“气球”事件，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科技经贸等领域频频对华施压发难，挑战中国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中方则更加坚定地发扬斗争精神，制裁美国对台售武企业，对美光等在华美企进行调查，对稼、锗、石墨等稀土原料实施出口管制，在台海继续谋求主动权与主导权，在南海坚决维护中国的权益。二是中美互动达到过去五年来的新水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商务部长雷蒙多、

总统气候变化特使克里、参议员舒默、加州州长纽森等相继访华，中国外长王毅、副总理何立峰等访美，中美在亚太事务、海洋、外交政策、军控等领域开展对话，并建立商务、经济和金融工作组。三是中美元首在旧金山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对稳定跌跌不休的双边关系、扩大两国间的合作面具有重要意义，也向动荡不定的世界释放了积极信号。

从中美关系演变的大背景看，旧金山会晤是拜登执政以来中美两国间最重要的外交事件，有助于推动处在转型期的中美关系的目标管理与过程管理，有助于界定中美博弈的边界。就中美关系的阶段性目标而言，中方提出希望构建稳定、健康、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美方则表示，不希望竞争导致冲突与对抗，这样稳定就成为中美双方的低水平共识。就过程管理而言，中美同意负责任地管控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因素，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同意恢复两军高层沟通、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开展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这些具体措施对增进相互了解、积累互信、规避和管控危机具有重要意义。就中美博弈的边界而言，元首会晤有助于推动美方界定对华经贸关系的边界，在推进对华外交竞争的同时留出合作的空间，在对华施压的同时守住不冲突的底线。在此次会晤中，中方强调中国有必须维护的正当利益，有必须捍卫的原则立场，也有必须坚守的红线底线，特别是在经贸科技问题上对美方提出的郑重交涉，在台湾问题上对美方发出的严正要求，有助于美方更清醒地认识到其对华博弈的腾挪空间。

中方希望旧金山会晤成为中美关系的新起点，那么，从旧金山再出发的两国关系能走多远、走多快？一方面，会晤后双边关系气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高层交往有望继续推进，各种对话磋商会陆续举行，在此过程中，双方关切的一些具体问题得到部分解决。另一方面，

2024 年的中美关系走向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拜登政府继续奉行对华遏制打压政策，使得摩擦和冲突成为双边关系的新常态。台湾地方领导人选举结果和美国大选都可能会冲击中美关系。一些意外事件也会导致中美关系的波动。总体而言，当下中美关系既受到大趋势的影响，分歧、摩擦甚至冲突都不可避免，又受到小周期的作用，有一定的缓和与改善空间。2024 年的中美关系能否保持稳定，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进展，有赖于双方的意愿与努力。

5、战争延宕下的俄罗斯时局

冯玉军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自 2022 年 2 月 24 日至今，俄乌冲突已经持续近两年时间。战争未能如俄罗斯预期的那样以其摧枯拉朽般的胜利而告结束，反而陷入了惨烈的相持战和消耗战。战争延宕之下，俄罗斯经济由 2022 年的衰退转为增长，在战场上暂时抵御住了乌克兰的反攻，但俄国内政治风险抬升，国际环境依然险峻。与此同时，俄罗斯并未改弦更张、甘心就范，一方面继续推进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另一方面以多种手段减轻经济压力、维系政局稳定、力争外交突围。2023 年，中俄两国高层交往延续既有势头，经贸关系实现历史性突破，双边关系定位回归常态。

一、政经压力与俄的应对

俄乌战争爆发后，美欧对俄实施全方位经济制裁，俄罗斯经济遭遇前所未有的外部压力，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联系加速断裂。2023 年 7 月，俄美月度贸易额仅为 2.77 亿美元，相当于美对俄实施大规模制裁前的 9%。2023 上半年，俄罗斯自欧盟进口额下降 31%，对欧盟出口下降 76%，对欧盟贸易占俄外贸总额的比例由 2022 年同期的 38% 降至 18%。俄罗斯在欧盟进出口中所占份额则分别从 2022 年 2 月的 9.6% 和 3.8% 降至 2023 年 6 月的 1.7% 和 1.4%。

在能源领域，七国集团和欧盟对俄罗斯海运出口和成品油出口实施禁运和限价，这导致欧盟自俄能源进口迅速萎缩。自战争爆发至

2023年10月，欧盟已将从俄进口的煤炭和天然气分别减少了90%和75%，欧盟有望在2030年前完全摆脱对俄的化石燃料依赖。

为突破制裁，俄罗斯积极利用不使用西方公司保险的“影子舰队”、通过打折销售的方式加大对亚洲市场的能源出口力度。在经历2022年12月至2023年2月短暂下降之后，从2023年3月份开始，俄石油出口逐渐恢复常态。至2023年5月初，俄石油出口数量已恢复至战前水平并创下新高，石油出口价格已断续突破七国集团和欧盟的价格上限，石油出口收入也出现了较大幅度回升。同时，俄也在通过平行进口、进口替代等方式减轻西方制裁带来的困难，通过扩大对军工行业的投资和订货强化“战时经济”，通过财政金融措施应对卢布贬值和通胀压力，通过强化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减少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但近来，美欧正在试图通过打击“影子船队”、延伸长臂管辖、强化加密货币监管等方式堵住制裁漏洞。

12月14日，普京总统在“年度盘点”活动上称2023年俄国内生产总值预计增长3.5%。但俄其他机构和人士对经济增长前景并不乐观。2023年4月，俄科学院预测，未来10年至15年俄GDP年均增幅将维持在1%的水平。经济学家们认为，西方对俄制裁短期不会解除，而可以支撑经济快速发展的潜力几乎已经用尽。按照俄央行12月15日的最新预测，2024、2025和2026年俄经济增幅将分别为0.5%-1.5%、1%-2%和1.5%-2.5%。在世界经济平均增速将保持在3%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俄罗斯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将继续下降。

战争和制裁使俄国内政治暗流涌动。曾深受普京器重并在俄乌战场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瓦格纳集团”发动兵变，兵锋直指莫斯科。尽管叛乱很快得以平息，但它集中反映出战局不利背景下俄国内的诸多矛盾和高层利益集团之间的重大分化。与此同时，尽管当局不断采取高压措施压制反战声音，但这也迫使反战力量改变了表达自身诉求

的方式。2023年，俄多名极端好战分子被反战力量以投毒和炸弹袭击的方式清除。数千名俄罗斯公民组成“俄罗斯解放军”和“俄罗斯自由军团”，配合乌军对俄本土进行袭扰。

同时也要看到，传统政治文化、20多年来得以重塑的垂直权力体系、不断鼓噪的民粹主义使“普京利用社会的冷漠和对大俄罗斯帝国往日历史的怀念，赢得了公众对战争的支持。”俄独立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近期调查显示，如果普京现在决定结束冲突，70%的俄罗斯人将支持他；但如果结束战争需要俄归还其在冲突期间占领和吞并的乌克兰领土，则只有34%的人会支持这一决定。这也印证了俄罗斯政治分析家的判断：“大多数俄罗斯人可能并不认同当局，但他们已经团结在克里姆林宫周围，认为当局正在以牙还牙，与企图摧毁俄罗斯的西方进行斗争。尽管这样的描述与现实不符，但许多俄罗斯人还是接受了这一说法，认为这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噩梦最合乎逻辑的解释。”

2023年12月8日，普京宣布将参加2024年总统选举。可以预见，普京在2024年后仍会继续掌握俄罗斯的权杖，这充分体现了俄罗斯民族心态和政治文化的长期惰性。但同时也不能忘记，在俄国历史上，重大战争的失利往往会导致国家出现颠覆性变化。在俄国这片暗流涌动的深海，出现任何突变都不会令人奇怪。

二、国际困境与俄“外交突围”

持续近两年的俄乌冲突使俄罗斯的国际环境大面积恶化。

俄罗斯与美欧等发达国家的关系跌至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来的谷底。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高层交往几乎已经完全中断，官方外交联系也只维系在最低水平，俄欧峰会、“俄罗斯北约关系理事会”等合作机制几近废弃；俄欧之间的陆海空联系基本已经完全“物理隔绝”，

人员往来急剧减少，俄罗斯在欧洲基本上成了一座“孤岛”；《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等军控协定已经失效，传统中立国芬兰、瑞典加入北约，俄欧安全关系全面恶化。

俄罗斯国际形象进一步垮塌，国际战略影响力受到冲击。俄乌冲突爆发后的四次联合国大会，都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要求俄罗斯立即从乌克兰全面、立即、无条件撤军的决议。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逮捕令，这是历史上对一个核大国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元首前所未有的举措。受此影响，普京总统难以出访《罗马规约》的缔约国。更为重要的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俄罗斯“滥用”否决权导致安理会无法正常发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功能表示不满，要求改革联合国包括安理会的呼声日益高涨，这也必将对未来联合国的形态以及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产生重要影响。

受俄乌冲突冲击，“后苏联空间”进一步分化，俄罗斯的地区影响力加速滑落。乌克兰、摩尔多瓦即将与欧盟开启“入盟”谈判，格鲁吉亚也成为欧盟的候选国；中亚国家“多元平衡外交”步伐更趋坚定，与中国、美国、欧盟、日本的“5+1”模式不断复制，同俄罗斯的距离进一步拉大；亚美尼亚因俄无法履行盟友义务而在同阿塞拜疆的地缘政治冲突中最终落败，对俄强烈不满，大幅减少了对独联体、欧亚经济联盟、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一体化机制的参与，迅速强化了同美欧的全方位合作。

国际环境恶化之际，俄罗斯不仅未俯首称臣，反而试图绝地反击。俄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对西方的疑虑和不满，主动刺激世界变乱之际甚嚣尘上的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和反西方主义思潮，综合性运用信息战、心理战和经济战等手段，为自己寻求同情者和“同路人”，“全球南方”因而成为俄罗斯外交的一条主轴。

政治上，俄罗斯竭力分化乌克兰和美欧试图构建的“反俄民主国

家阵营”。尽管乌克兰和西方担心俄罗斯对自由民主秩序的破坏，但大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的注意力主要都集中于经济发展和粮食安全等问题上。再加上“即使全球南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行为心存疑虑，但也很少愿意看到一个胜利的西方”，因而虽然全球南方多数国家承认“俄罗斯入侵邻国是错误的”，但它们更愿意在俄乌之间采取中立态度，避免过度卷入，甚至试图与俄保持良好关系。

经济上，俄罗斯积极拓展全球南方市场，试图以此突破美欧对俄经济制裁。亚洲市场已成为俄突破西方能源禁运和限价的最重要突破口。2022年，有近4000万吨石油和石油产品从西方市场转移到东方市场。截至2023年11月，这一数字已经达到1.4亿吨。印度和中国吸收了俄罗斯对欧洲石油出口损失的近80%。此外，俄罗斯也在以各种方式通过中亚及中东国家推进“并行进口”，以此规避西方的出口管制，获取难以从发达国家进口的相关产品和技术。

安全上，俄罗斯重点强化与朝鲜、伊朗的军事技术合作，以为延续对乌战争获取更多军事资源。7月，俄防长绍伊古访问朝鲜，为从朝鲜获取军火支持探路。9月中旬，金正恩访俄并与普京进行了深度交流。国际独立军事分析机构称，此后一段时间，朝鲜向俄罗斯提供了超过2000个集装箱的军事装备和弹药。伊朗与俄罗斯近年来在军事领域多有合作，双方出于各自利益，相互需求、相互支撑。伊朗生产的无人机成为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弥补自身短板、对乌发动攻击的重要武器。此外，俄也在千方百计激化其他国际热点冲突，以减轻自身战略压力。近两年来，塞尔维亚—科索沃矛盾激化、尼日尔等非洲国家政变、缅甸及南海局势变化特别是加沙冲突爆燃的背后都有俄罗斯深深的“暗影”。

同时要看到，尽管俄罗斯的外交突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其国际环境恶化的总体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性缓解，其在全球南方

的外交行动也不可能完全如愿以偿。一个明显例证是，只有 17 个非洲国家的元首参加了 2023 年 8 月举行的第二届俄非峰会，较之 2019 年首届峰会时有 43 个非洲国家领导人与会无疑大为逊色。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的一项研究显示，非洲国家在一年多来对联合国大会通过的 7 项反俄决议的投票中立场并不一致，1 至 3 次投赞成票的国家有 11 个，4 次以上投赞成票的国家有 24 个，而从未投票赞成反俄决议的国家只有 19 个。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俄罗斯在全球南方的现实影响。

三、中俄关系

俄乌冲突延宕之际，中俄关系依然保持了多年以来既有的合作势头。

政治领域，两国元首会晤、总理定期会晤、议会交流、执政党交流以及能源、投资、人文、经贸、地方、战略安全、执法安全等各级别合作机制，在疫情结束后基本上恢复了线下交流。3 月 20 日至 22 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他再次当选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同时也延续了把俄罗斯作为首访目的地的传统。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俄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和《2030 年前中俄经济合作重点方向发展规划的联合声明》，对下阶段双边关系发展和各领域合作做出规划部署，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林业、基础科学、市场监管、媒体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文件。2023 年 10 月，普京总统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盛赞习近平主席 10 年前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取得巨大成功，已经成为世界公认的重要国际公共产品。习近平主席则表示普京总统连续三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体现

了俄方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支持，强调俄罗斯是中国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伙伴。

经济领域，2023年1至11月，中俄贸易额同比增长26.7%，达到创纪录的2181.8亿美元，提前实现两国领导人制定的2024年贸易额达到2000亿美元的目标。其中，中国对俄出口达1003.4亿美元，同比增长50.2%，中国自俄进口达1178.4亿美元，同比增长11.8%。2023年1至11月，俄对华供应原油9746万吨，同比增长22.17%，交易额达550.18亿美元。俄重新超越沙特成为中国第一大原油供应国，对华出口原油比沙特多出1749万吨。预计2023年全年俄对华石油出口将突破1亿吨。2023年前三季度，俄对华天然气供应量同比增长46.6%，预计全年对华天然气出口量将超过300亿立方米并刷新历史最高纪录。2023年前10个月，俄对华出口面粉超过10万吨，同比增长2.7倍，中国已成为俄面粉的第三大出口国。数据表明，中俄经贸关系不仅未受到俄乌冲突和西方对俄制裁的冲击，反而逆势增长，在多个领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突破。2023年12月19日，中俄总理第二十八次定期会晤在北京举行。两国总理一致认为，当前中俄两国都致力于发展振兴，双方要进一步提升中俄关系发展的内生动力，拓展双边贸易往来及农业合作，为对方企业赴本国投资创造更好营商环境，共同维护两国能源安全，加强互联互通，增进人员交流和地方合作，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国际领域，中俄在一系列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立场相同或相近，保持密切沟通和合作。2023年，双方继续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上合组织、亚信会议、中俄印、中俄伊、中俄蒙等共同参与的多边机制框架内进行密切协调。7月，伊朗正式加入上海合作组织。8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决定邀请阿根廷、埃及、埃塞俄比亚、伊朗、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2023年中俄两军交流热度不减。俄罗斯防长绍伊古访华，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访俄。俄军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7月在日本海组织的“北部·联合-2023”演习。中国、俄罗斯、南非三国海军2月在南非海域举行第2次海上联合演习。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海军3月在阿曼湾举行“安全纽带-2023”海上联合军事演习。

2023年2月24日，中国外交部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提出了尊重各国主权、摒弃冷战思维、停火止战、启动和谈、解决人道危机、保护平民和战俘、维护核电站安全、减少战略风险、保障粮食外运、停止单边制裁、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战后重建等12点主张。5月，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访问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欧盟总部和俄罗斯，就推动乌克兰危机政治解决进行外交斡旋。8月，李辉赴吉达参加了第二届乌克兰问题国际和平会议。

中国反对动辄发动经济制裁，未参加对俄实施的制裁行动。同时，中国企业和银行等相关主体也未系统性违反美欧对俄制裁禁令，避免了遭受次级制裁。

在俄乌冲突延宕的情况下，有关中俄关系“无止境、无禁区、无上限”的说法淡出了官方的话语体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基本原则重新回归，中俄关系更加明确地定位于“永久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互利合作共赢”。

6、2023 年欧洲对华政策：暖中有寒

简军波

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2022 年底，随着欧盟及其部分成员国的领导人在不同场合与我国国家领导人举行会见或会晤，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的中欧关系僵局被逐渐打破。在此基础上，2023 年，在和中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欧盟及其成员国乘势而上，加强对华交流，中欧关系呈现趋暖回稳态势，但其中暗藏的隐忧也不可小觑。

一、欧盟与我国官方交流逐步恢复并有所发展

2023 年，中欧间官方交流逐渐热络，双方正式交流机制也逐步恢复。4 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赴华访问。她此访主要目的在于进一步恢复和规范后疫情时代对华经贸关系，同时在地缘政治领域对我国施加一定压力。为此目的，冯德莱恩在出访前夕的一次演讲中专门提及欧洲与中国“脱钩”（de-coupling）并不可行，认为应关注对华“去风险”（de-risking）。她的访问一定程度上奠定了 2023 年中欧关系发展基调。

4 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因身体抱恙放弃了本应来华的访问，但他在一篇专文中表示，欧中在气候变化、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新冠疫情等领域存在多边合作空间。历经波折后，博雷利最终于 10 月访华，与中国同行举行了第十二轮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博雷利此访中反复强调希望中国将欧盟视作一支独立国际力量。

除上述领导人访问外，欧盟其他一些高官也相继来华。7 月，欧

委会副主席兼气候问题首席谈判代表蒂默曼斯来华和中国同行举行了第四次中欧环境与气候高层对话，呼吁欧中联合行动以应对气候危机。9月，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斯访华，与中国同行举行了第十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

2023年12月，中欧关系进入该年回暖小高潮。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联袂访华，共同参加第24次中国—欧盟领导人峰会。这是时隔四年后中欧双方领导人首次举行线下峰会。此次峰会重要特点是双方坦诚面对各自关切，共同寻求合作空间，助力改善双边战略互信的缺失。

纵观2023年，欧盟不同机构和不同层级领导人相继访华，显示出欧盟试图恢复和重启线下双边交流机制，改善对华关系的强烈意愿。

二、德、法、西等欧洲大国积极发展对华关系

除欧盟外，2023年，欧洲一些大国如德国、法国、西班牙等也高度重视和试图恢复与发展对华关系。

4月，法国总统率团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随行团组包括法国电力公司、阿尔斯通、空客等几十名企业高管。访华期间，中法发表联合声明，誓言推动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值得一提的是，马克龙访华后回国途中宣称欧洲不能成为美国“附庸”，并指台湾安全非欧洲问题，显示其独立发展中法和中欧关系的决心。11月，中法两国元首又通过电话进行了交流。除元首外交外，两国其他层级官方交流也较热络，包括2月和10月，中法分别举行了第二十三次和第二十四次战略对话，7月举行了中法高级别经济财金对话，11月举行了中法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第六次会议，法国国民议会中的法中友好小组代表团访华等。

2023年没有德国国家领导人访华，但双边官方交流并不少见。3月，德国联邦议院绿党议会党团外交政策发言人特里廷访问北京；11月，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巴格尔到京与中方共同举行副外长级政治磋商；12月，德国联邦议院联盟党党团副主席瓦德普尔率代表团来华交流等。

在德、法主动加强对华交流后，6月，我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访问上述两国。李强访德期间，与德国总理共同主持了第七轮中德政府间磋商，以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挖掘双边合作新机遇。李强总理访法期间，与法方领导人进行了交流，提升了双边政治互信。他还参加了法国组织的新全球融资契约峰会。

良好的政治互动为中德和中法经贸交流奠定了基础。在欧洲鼓吹“去风险”论调背景下，2023年中德经贸关系逆势上扬。以投资为例，在德国总体对外投资下滑情况下，近年德企在华直接投资占德国对外总投资比例持续上升，2019年上半年为5.1%，2022年上半年为11.6%，2023年上半年攀升至16.4%。中法经贸交流也有发展。2023年1-8月，中法进出口贸易额达3725.8亿元人民币，法国实际对华投资增长105.6%，法已成为中国在欧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成为法国在亚洲第一大贸易伙伴。

除德法恢复和加强对华关系外，西班牙也深化了对华合作。3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访华。此访恰逢双方建交50周年。桑切斯还出席了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除领导人会晤外，2023年中西还举行了双边外长会晤。

上述德、法、西等欧盟大国恢复和强化对华关系的举措，在整体和基本面上促进了中欧关系良性发展，为恢复和推进中欧进一步合作奠定了基础。

三、若干中小国家也积极寻求对华合作机遇

在欧盟及其大国积极改善和深化对华关系同时，其他欧洲国家对华政策因各自利益和立场差异显得各不相同，其中若干国家采取了继续深化对华关系举措。

首先，匈牙利强化对华友好。10月，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率团在中国进行了为期近一周的访问。欧尔班还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是唯一有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参加此次高峰论坛的欧盟成员国。

其次，希腊寻求拓展对华关系。11月，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率团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访华期间他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的公正立场，并表示希腊愿成为欧中合作的桥梁。其中部分访华人员还参加了11月5-10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进博会。

第三，塞尔维亚加强对华关系。2023年10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访华期间，两国政府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产业与投资合作谅解备忘录等多项合作文件。值得关注的是，双方还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这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签署的首份自贸协定。

此外，2023年丹麦、瑞士和部分中东欧国家也曾派员访华。其中，3月，丹麦外交部常务秘书叶普赴京举行中丹副外长级政治磋商；11月，丹麦议会外交政策委员会代表团访华。3月，瑞士外交部亚太司司长来华进行政治磋商。另外，5月和11月，中国宁波和沧州分别举办了第三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和第五届中国-中东欧国家中小企业合作论坛，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官员和企业皆积极参与上述两个国家级机制平台的活动。

四、欧洲对华政策暗含结构性隐忧

尽管 2023 年欧盟及一些欧洲国家主动恢复和发展对华关系，但中欧关系中有一些长期存在的矛盾因素，成为中欧关系中的长期隐忧。

首先，“经济与科技竞争”政策下的“去风险”。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 4 月访华前再次重申了实施对华“去风险”政策，以代替“脱钩”政策。7 月德国发布的该国首份“对华战略文件”也将对华“去风险”与“脱钩”相区别。德国总理朔尔茨强调他“反对（对华）脱钩”，并表示“去风险化不是去中国化”，等等。然而欧洲所谓的“去风险”含义模糊不清，欧洲各界均没有充分确定需与中国“去风险”的具体范围或领域，也没有达成内部共识。

从 2023 年实际情况来看，欧洲对华“去风险”范围实际上超越了经贸领域。除呼吁欧洲企业在关键原材料和投资市场等方面降低对华“依赖”，从法律角度推动“供应链法（草案）”“反胁迫工具法”等制订外，欧盟和部分成员国还在高科技和高等教育合作及人员交流方面对华施限。因此，“去风险”政策不仅已嵌入中欧经贸领域，更延伸到了非经贸领域。

其次，“制度性对抗”政策下的双边冲突。欧盟自 2019 年将“制度性对手”作为定位中国在欧盟对外战略中的角色之一，这将触发中欧多方面政治冲突。尽管 2023 年欧盟在地缘政治领域和中国发生冲突的案例和程度并不显著，但部分欧洲国家推动对华地缘政治冲突的意愿在增强。这包括但不限于：通过北约和七国集团等西方多边机制，部分欧洲国家试图将北约势力延伸到中国周边；在“印太”地区与美国和与中国有地缘政治竞争国家的安全与战略合作；在芯片领域附和美国的对华政策诉求等。此外，有些国家在双边层面主动损害对华关

系，这包括有意加强与中国台湾的政经联系，以及在其他涉华议题上干预中国内政。一些国家有意抨击中国 - 中东欧合作机制，以及诋毁或退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等。

第三，经贸领域的新旧挑战。2023年欧盟对华经贸领域的不满情绪主要体现在三方面：对华贸易逆差、新能源汽车补贴及严格的市场开放政策。自疫情以来，欧盟对华贸易逐渐出现大量逆差（如2022年逆差约为4000亿欧元），尽管其形成出于市场供需而非中国政策实施的结果，但逆差成为欧盟指责中国的一大把柄。另外，欧盟在2023年6月决定对我国对欧新能源汽车出口实施反补贴调查，受到中国政府强烈反对。此外，欧盟基于安全对我国赴欧投资限制及欧盟抱怨我国对欧盟资本在众多行业的限制，使双方都不满对方针对自身的投资政策。市场准入将成为中欧经贸中一个长期的冲突焦点。

五、中欧关系近期展望

展望2024年及将来一段时间，欧盟对华政策回暖趋势还会继续，但能否持续更长时间，重构中欧长期友好关系，将取决于以下几方面因素：

第一，美国因素。尽管欧盟领导人声称其对华政策独立自主，但实际上受中美博弈和美国影响甚深。以中欧峰会为例，它是欧盟坚持在欧美峰会举行、欧美协调对华立场后才举行的一场峰会。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将会深刻影响跨大西洋关系，也将因此对中欧关系带来影响。

第二，俄乌冲突的因素。俄乌冲突成为欧盟决定对华政策重要因素。中国如何对待俄乌冲突及俄乌冲突最终结局，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欧盟及其成员国对华政策。若不久的将来俄乌冲突得以结束，则

欧洲因解除了东部安全威胁而在对华政策上采取更为负面的举措，或因不再受制于美国的安全制约而愿采取更为灵活与舒缓的对华政策，这取决于欧盟和欧洲各国的战略认知及对中国在俄乌冲突立场上的态度。

第三，欧盟选举因素。2024年欧洲议会及其机构领导人的改选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欧盟对华政策。欧洲议会的成员构成、新当选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对华立场，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欧盟对华政策。

无论如何，从宏观角度来看，欧洲对华政策在未来较长时间内会因经济领域不可完全脱离的相互依赖及在气变等全球治理领域的合作需要而寻求一定合作，但随着国际格局的变迁和全球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情势，中欧关系的复杂性和挑战性也会日益增多，冲突性合作或合作中冲突将成为中欧关系的新常态。

7、中日关系：再确认与再出发

胡令远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5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与去年相比，今年的中日关系总体上相对平稳，主要有以下影响因素所致。

首先，负面要素存量即三年疫情中积累的负面因素，伴随着新冠疫情阴霾逐渐消散、各种交流次第恢复展开而得以有所稀释与缓解。特别是2022年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曼谷共识”，借助今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5周年重要历史节点，在两国高层、经贸、人文等领域逐步落实。

其次，突发事件、重大事件冲击力的递减效应。主要为2022年2月突然爆发的俄乌冲突对东亚地缘政治的冲击，特别是美日等借机把俄乌冲突与台海问题相提并论的炒作。此外，围绕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引发的，特别是与此相关的所谓中国导弹落入日本经济专属区、日方提出所谓强烈抗议事件的影响。最后，2022年12月日本政府正式推出“安保三文书”，将中国定位为“迄今为止最大的战略挑战国家”，由此决定今后5年军费翻倍、研制和引进战略性进攻武器等的举措等。

一、中日关系整体上处于“战略性消极状态”

虽然2023年中日关系总体相对平稳，但两国关系依然处于“战略性消极状态”也是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结构性矛盾的存量与增量相叠加，战略性疑虑不断深化。中日之间的领土及东海海洋权益争端、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这些旧有结构性矛盾尚未解决，与此同时伴随着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差距的迅速拉大，日本在国家安全的认知上，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加大和深化。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作为中国近邻的“岛国”日本在“涉海”问题上的高度敏感性，如前述与2022年佩洛西窜台相关的所谓中国导弹落入日本经济专属区事件、“安保三文书”的出台等，都与此密切相关。它们的冲击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减弱，但其内含的核心诉求却不断沉淀下来，显现出冷战后特别是中日GDP逆转之后，这十余年来逐渐生成的中日间“海洋安全困境”——这一新的结构性矛盾并不断凸显且与旧有结构性矛盾相关联、相叠加的特征。中日“海洋安全困境”，既与岛国的自然禀赋对海洋交通要道的特殊诉求相关，也内嵌有日本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逻辑。

其二，日本版“印太战略”多重结构的打造与深化。2023年，日本继续推展和加大针对中国的日本版印太战略的举措和力度，并有新的突破。如日本积极配合美国，特别是与韩国尹锡悦政府积极互动，通过首脑穿梭外交，营造“日韩和解”氛围。在此基础上，8月18日美日韩三国领导人聚首戴维营，这一在多边会议以外首次单独举行的三方峰会，意在美日、美韩“双同盟”的基础上，实现美日韩三国同盟关系的“一体化”，打造针对中国的东亚“小北约”。因此人们看到，在峰会形成的文件中三国宣称：“关于我们最近看到的中国在南海支持非法海洋主张的危险和挑衅行为，我们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印太’水域现状的企图。”；同时，在台海问题上三国强调：“我们重申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这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我们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云云，显然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这是美日韩三国首

次以峰会文件方式针对中国正式共同发声，无疑会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不仅在以上传统安全领域，而在所谓的经济安保方面，日本也积极协力美国，推展“印太经济框架（IPEF）”，打造制约中国的“小院高墙”。如2023年，日本政府出台并实施限制对外出口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并对相关环节和技术问题进行管制。其针对中国的指向性是显而易见的，目的在于配合美国遏制中国制造先进芯片的能力。这种把贸易和科技问题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和举措，对中日关系造成的伤害，具有政治和经济相叠加的双重性质。

其三，提升日本版印太战略的“枢纽地区”——东南亚关键国家关系。2023年，包括岸田文雄首相在内的日本政要，频繁出访被日本视作印太战略“枢纽地区”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是以其中在南海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为重点拉拢对象。继日本外相上川阳子10月访问越南等东南亚四国之后，11月岸田首相访问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确认了双方加强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并就启动使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军队相互顺畅往来的《互惠准入协定》（RAA）的缔约谈判达成一致。同时，日本决定根据今年4月设立的旨在向他国提供防卫装备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框架，向菲律宾提供价值6亿日元的海岸监视雷达。12月，日本-东盟特别峰会在东京举行，在日本的推动下，峰会在联合声明中提出所谓“加强海洋安保合作”。为将东盟打造为推行日本版“印太构想”的重要支点，本次峰会上，日本又宣布向马来西亚提供预警和监视设备，向印尼提供日本制造的大型海上巡逻艇等。此外，今年10月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访问日本，双方就把两国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一致。同时确认将在安保领域扩大合作，还就日本把越南列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的支援对象展开讨论，一致同意基于《防卫装备品

及技术转移协定》推进日本向越南出口装备品。这些都基于岸田首相所强调的“越南是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 - 太平洋的关键伙伴”的基本定位。

其四，在台湾问题上持续挑战中国底线。今年8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副总裁、前首相麻生太郎窜访台湾，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访台的最高级别政治人物。这一行径，代表了日本政客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日关系红线的行为，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信号，值得高度警惕！

二、中日关系定位的“再确认”与再出发

如前所述，尽管今年的中日关系较去年相对平稳，但依然矛盾重重。特别是2023年日本决定并实施将福岛核污染水直接排海后，遭到世界多国反对。中国对这一严重贻害人类生存环境的不负责任行为予以谴责，并决定全面禁止日本海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正义、合理之举，日本却咬定全世界只有中国采取这种态度和反制手段，是别有所图。

然而，因为中日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面对严峻局面，也必须不断探索如何走出困境，面向未来之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利用今年11月旧金山APEC峰会机会，习近平主席与岸田文雄首相之间的首脑外交。以中美关系在止跌企稳的关键时刻形成“旧金山愿景”为背景，中日两国首脑再次确认“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并赋予新内涵。习近平主席在与岸田首相的会晤中强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中日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中日关系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双方应该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岸田则做出“希望着眼未来，增加两国关系积极因素，坚持和平共处”等积极回应。

去年 11 月，习近平主席与岸田文雄首相在曼谷会晤并形成 5 点共识，对于稳定新冠疫情后的中日关系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次的“旧金山之约”，显示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两国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 45 周年的重要节点，重温初心，再次确认两国关系的“定位”；同时面向未来，赋予其新的内涵。不言而喻，这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视角把握中日关系大局和取向之举，意义重大。以此为指针，双方同意本着建设性态度，通过磋商谈判找到解决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合适途径，并积极评价刚成立的中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同意保持各层级对话沟通，适时举办新一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会议等。

以这些共识为背景，11 月 26 日，时隔长达 4 年的中日韩三国第十次外长会议在韩国举行。王毅外长表示，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中日韩应以更进取姿态，推动三国合作重回正轨，保持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韩、日外相朴振、上川阳子表示三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加强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是必由之路。为三国领导人会议做好各种准备，也是这次外长会的重要议题和目标。使人们对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经济合作的扩大，给予很大的期待。

2023 年的中日经贸合作，虽然受到“经济安保”的影响，但依然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今年前 10 个月，中日贸易额为 2564.18 亿美元，与往年持平。在今年的上海进口博览会上，有多达 300 多家的日本企业积极参展，居外企首位。

三、愿景与展望

总而言之，今年的中日关系虽然整体相对平稳，但国民感情依然

在低位徘徊，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降至新低，负面观感却高达90%以上。中美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美国对华制衡总体战略并未改变。而在当前日本国内政治不断右倾保守化的背景下，希望日本很快改变偏执的中国认知并在此基础上调整对华战略方向，是不切实际的。当务之急是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扩大各领域各层级对话交流，确认中日关系中的“底线”和“护栏”，增强务实合作，确保中日关系的大局稳定。与此同时，为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稳定的、建设性中日关系，双方应积极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国的根本相处之道，以及新的平衡点和最大公约数。不言而喻，这是一项长期性和战略性要务。

8、印度：积极作为的一年

张家栋

复旦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2023年，印度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两次举办G20峰会和全球南方之声峰会，刷新了国际存在感。印人党在邦选举中获得胜利，巩固了执政地位，2024年大选前景看好。总体来看，虽然仍然存在很多隐患和问题，但印度已加速从地区大国向世界大国迈进的步伐。

一、印度经济快速增长

2022年，印度GDP总量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在2022（4月1日）-2023（3月31日）财年，印度GDP增长7.2%，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居首位。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15%的贡献，仅次于中国和美国，居世界第三位。进入2023年，印度经济继续快速增长，在前三个季度，印度GDP增速分别为6.1%、7.8%和7.6%。2023年第四季度，印度经济指标也好于预期。印度央行（RBI）预计，在2023-2024财年，印度GDP增速将为7%。

印度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成效明显。2023年，印度政府在基础设施上的投资达到1220亿美元，比上年增加33%。不断增加的投资，使印度的基础设施产生了本质性变化。2014年以来，印度每年新增高等级公路约1万公里，机场数量增加了一倍，铁路运输效率也明显提高，互联网覆盖率明显提高。印度注册网民达8.8125亿人，居世界第二位。印度的电子支付系统发展迅速，约2.6亿人使用“统一支付接口”（UPI），

让印度在支付领域领先于世界绝大部分国家。

印度的金融和债务状况总体健康。印度政府债务占 GDP 的比例较低。2023 年 6 月的数据显示，印度政府债务占名义 GDP 的比例为 58.3%，低于 2021 年 3 月的最高值 58.6%。印度对外资的吸引力逆势上扬。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占 GDP 的比例，2000 年时为 3.3%，在 2018-2022 年间下降到 1.3%。在此期间，印度获得的 FDI 从 2015 年占全球 FDI 的 2.1%，上升到 2022 年的 3.8%。2023 年，印度所吸收到的净 FDI 将会减少，但没有影响印度的整体金融状况。2023 年，摩根印度指数（MSCI-India Index）上涨了 12%，远远高于 MSCI 新兴市场指数的 2%。

二、印人党继续执政是大概率事件

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以及印度政治权力的集中化，是当前印度政治的主要特征。

一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继续崛起并对印度国家认同不断再造。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核心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在印度社会中占据强势地位，深耕印度基层，是印人党在 2014 年和 2019 年两次赢得大选的重要因素。现在，印人党政府内阁核心成员，几乎与国民志愿服务团都有些关系。

印度教民族主义使印度的内外政策更加主动、积极。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认为，印度首先要成为一个印度教国家（Hindu Rashtra），实现“有组织的统一”（Sangathan）和“种族净化”（Shuddhi），然后才能建成“统一印度”（Akhand Bharat）。这对印度的内政外交都有强大的影响。在内政方面，2019 年，印度通过《公民身份法（修订）》，废止查谟一喀什米尔邦（Jammu and Kashmir）的特殊自治地位，

强推国家法律体系一体化进程。在外交方面，莫迪总理提出“印度的天命”概念，将印度视为“世界导师”（Vishwa Guru）。

另一方面，印人党在地方选举中再占上风。2023年，印度有9个邦举行议会选举，其中印人党执政或参与执政的邦有4个，国大党执政的邦有2个。选举结果是：执政的印人党在卡纳塔克邦输给国大党，执政的国大党在拉贾斯坦邦和恰蒂斯加尔邦输给了印人党，印人党在拥有5600万选民的中央邦继续保持控制权。尤其是2023年12月的五邦选举结果公布以后，印度股市迅速上扬，表明印度工商界看好印人党继续执政的经济前景。国大党则赢得拥有海得拉巴IT中心的特伦甘纳邦，以及拥有班加罗尔IT中心的卡纳塔克邦。这种布局凸显了印度政治格局的南北分歧。

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和恰蒂斯加尔邦在印度人民院有62个席位，印人党获胜是2024年大选的重要风向标。总体来看，莫迪总理的支持率很高，印度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印人党政府可以利用执政地位、通过扩大福利开支和绕开地方政府直接争取选民。以国大党为代表的反对党虽然也试图加强团结，并组成“印度全国发展包容性联盟”（Indian National Developmental Inclusive Alliance），简称“印度联盟”（INDIA），以与印人党提倡的“婆罗多”（Bharata）概念相对抗，但协调困难。印人党赢得2024年大选是大概率事件。

三、印度大国雄心上升

印度在南亚的优势地位更加巩固，对外政策更加积极主动。在8月15日的独立日演讲中，莫迪宣布印度正站在转折点上，称新的世界秩序已经形成，印度具有人口、民主和多元三重优势，已准备好塑造国际新秩序，“世界将从印度散发的光芒中得到灵感”。

印度一年两次举办 G20 峰会，实属罕见。2023 年 9 月，印度主办 G20 峰会，吸引非盟加入 G20，把 G20 变成事实上的“G21”。印度主导的 G20 峰会更加聚焦发展、债务和气候变化等议程，以其平衡而得到俄罗斯的赞扬。在峰会期间，印度还与欧盟、法国、德国、意大利、沙特、阿联酋和美国签署备忘录，承诺发展“印度 - 中东 - 欧洲经济走廊”（IMEC）。印度还于 2023 年 11 月 22 日再度召开 G20 线上峰会，以推动 G20 峰会联合声明的落实工作。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了线上 G20 峰会并发表讲话。印度还出口转内销，发挥 G20 的国内政治功能。印度共举办约 100 次涉及 G20 的活动，涉及几乎所有的印度省级行政单位，让很多印度民众首次体验到印度的大国地位。

印度两次举办全球南方国家之声峰会，试图主导全球南方事务的话语权。2023 年是全球南方概念的再发现之年。1 月，印度邀请 125 个国家和地区举行“全球南方国家之声”线上峰会（Voice of Global South Summit）。2 月，慕尼黑安全会议主题之一就是“重新调整南方与北方合作的罗盘”。5 月，日本广岛 G7 峰会的大议程之一就是“加强与全球南方的联系”。为巩固自己在全全球南方概念上的主导权，2023 年 11 月 17 日，印度主办第二届“全球南方之声”峰会，并讨论了巴以冲突等新地区安全问题。

印度还努力扩大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努力在国内外塑造“婆罗多叙事”。在 G20 峰会上，印度以婆罗多自称，试图以本土概念 Bharat 替代国际概念 India，以摆脱殖民主义色彩。为此，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ICCR）还于 12 月初举办第一届“知识印度”国际大会，印度外交部长、教育部长和传统医学部（AYUSH）部长参会并发言。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发言中称，印度崛起不能仅体现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在文化上也要崛起。很明显，文化已经被印度视为大国地位的支柱之一。

四、中印关系继续处于冷淡状态

2023年，中印关系曾有改善的机会，但最终没有实现突破。中印延续了疫情以来两国领导人没有双边正式会晤的历史，没有打破中印关系的冷淡状态。

中印在边界地区的重兵对峙仍然存在，在经贸和人文领域的紧张局面没有本质性缓解。印度继续打压中国在印企业和人员，给中方带来严重困扰。印度向中国企业施加压力，试图实现中国企业的“印度化”，要求中国在印企业增加印度资本和印方管理人员，明显突破正常政企界线。中印人文交流水平也非常低。2023年4-5月，中印驱逐或变相驱逐对方记者。此举并没有太大的实质性意义，但却是中印人文关系薄弱的标志。印度继续对中国人的签证申请进行严格审查，导致中国工商人士和学者访问印度、进行正常工作和交流活动的困难很大。

但是，中印关系破局的可能性也在上升。一方面，中印边界争端形势稳中有缓。自加勒万河谷事件以来，截至2023年10月10日，中印已经举行20轮军长级对话，已经在加勒万河谷、班公湖等四个地区完成脱离接触。中印在德普桑地区的分歧虽然很大，但态势稳定。另一方面，中印的人文交流有破冰迹象。从2023年11月开始，复旦大学和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代表团先后访问印度、进行双边对话，打破了疫情以来没有中国二轨代表团访印、参加双边对话的僵局。印度此举是一个试探，还是政策调整的开端，仍有待观察。印度政府目前正全力准备2024年大选，不愿因中印关系改善而冒国内政治风险。但是，中印在恢复直航和签证便利化等领域，明显存在共同利益。

小结

随着国力的上升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崛起，印度内政外交与传统路线的差异越来越大。印度不再像过去那样强调印度与西方之间的价值观共识，转而大力建构“婆罗多叙事”，强调民主政治的印度特色和印度根源；不愿接受西方学生的形象，转而要充当世界的导师。这些变化在短期内提升印度的存在感，但在长期内也会影响印度与西方之间的关系。

9、螺旋下降的东北亚与朝鲜半岛

郑继永

复旦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2023年的朝鲜半岛，经历了不断的盘整与变化，经济失速、政治下滑、军事对抗、文化冲突弥漫，整体呈螺旋下降态势，并不时有令人心悸的动向出现。朝鲜半岛的阴云不仅影响到其内政外交演变，更对东北亚环境都产生着塑造作用。2024年的东北亚，经济、政治、安全与军事的新变化与大调整引发的态势复杂性显著增加。如此的乱局之中，虽然有对乱局的助推与利用冲动，但其间存在的企稳向心力仍然存在。

一、朝鲜半岛的内政外交

（一）内政经济不安、内讧成主题

韩国经济面临着多种内外部因素的持续变化和挑战。内部政治社会的变动、新冠“后遗症”及中美关系的急剧变化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巨大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社会的体感上，更在于政治形势的转变等内部事务上。

从国际环境来看，全球经济的结构性调整、韩国财阀经济遇挑战是韩国经济没有起色的决定性因素。但批评声音认为，确实存在着这些客观因素，只是因执政势力的误操作放大了不利因素，才导致经济的不振。

首先，总统失政与连环内斗拖累韩国经济

尹锡悦被称为“不懂不通不行”总统。政治上看，作为政治素人的尹锡悦过度重用检察官势力，并插手党内事务，与保守媒体勾连，过度妨碍韩国公正正义。经济上看，经济新手尹锡悦打破了过去“保守势力擅长经济”的定式思维，经济政策毫无建树。2024 财年预算案同比仅增加 2.8%，甚至低于 3% 的通胀率，是有记录以来最低的增长率。

对在野党党首李在明的追杀导致联政失败，导致包括经济政策在内的各种议程停摆。尹锡悦上台之后首开韩国宪政先河，对在野党党首李在明采取极限政治追杀，却遭到宪法法院驳回。在野党也展开生死斗争，展开了诸如人事任命、动议对第一夫人进行特检等的全力反击。

第一夫人因涉嫌贪腐被共同民主党提出特检动议若能通过，将成为尹锡悦的两难选择：第一夫人将被示众式不断公开各种违法行为成为巨大政治风险，而行使总统否决权则会带来掩护政治罪恶的不利舆论，严重影响民心向背和国会选举。

其次，政治挫败激化两党内部矛盾

面对 2024 年国会议员选举，国民力量内部的检察官系、原保守系、新势力系严重分裂，纷纷宣布要组建新党应获得、扩大政治地盘。而在野党内部也因现任党首李在明的法律风险问题、党内叛乱鼓动通过对李在明逮捕案的清算问题、选区划定与选举制度改革等问题出现内讧。前党首李洛渊不断宣称要组建新党以威胁李在明让渡权力。在野党为缓和党内矛盾、重新团结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 外交安全冒险、冒进成主流

首先，尹锡悦以激进亲美外交为轴心进行大幅调整

尹锡悦政府的外交路线改变了过去对美追随外交的基轴，可总结为三个关键词：亲美、强军、疏华，即以过度远华来诠释亲美外交。

尹锡悦与夫人高调连续的强行军式外交行程，被批评无原则追随并效仿美日、只注重形式、礼宾，而鲜少应对国际形势；各类活动中的失礼、失言、失格行为更让韩国人批评“令韩国蒙羞”。世博会申办大比分失败则更被批评为“无能力、无担当、无对策”，浪费国帑。

虽然遭到了严厉批评，但尹锡悦的“全球飞”外交政策一直围绕着加强同盟关系、承担更多同盟义务，特别是与美国的战略合作，在印太战略中发挥积极作用来做文章。如加强对南太的介入，积极推动美日韩三边合作，强行提升对日外交层级，甚至强调韩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中枢国家作用，要求发挥美国的全球盟友作用等。

尹锡悦政府将韩国国力定位于全球十大强国，急于摆脱“中等国家”的传统定位，并以军售等手段积极介入俄乌冲突来突显其“全球后勤枢纽”地位，不顾降等中韩关系而强行突入台海与南海问题；同时抬升美日韩合作关系，加强常规反潜和反导演习的同时，与日本的情报共享和军需互助协定也得到了大幅加强，效仿日本配合美国的战略行动和战略布局，推出了韩国版的“印太战略”；韩美日关系出现了由伴而盟的实质性进展，在情报、互操作性、后勤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合作局面。

其次，结构性改变涉台举措导致中韩关系进入“不舒服”阶段

基于冷战及之后全球冲突的经验总结，以及美国的战略资源与盟伴体系，韩国战略界主流认为，在目前激烈的中美竞争中美国取胜毫无疑问，中韩关系出现了从过去的观望骑墙到故意螺旋式下沉的突变画风。韩国也从过去的被动适应，转向有意搅动局势变化。换言之，在目前的东北亚局势及中韩关系转换中，韩国已经从追随力量转变为主动带节奏、故意推高局势恶化的力量，成为美国“皇协军”“辅警”。

在涉华问题上，尹锡悦政府声称将“基于尊重与普世价值、规则”等发展中韩关系，选择与美国一道参与围堵中俄朝伊等国，加强“印

太地区秩序的构建”。

尹锡悦政府废弃了诸多前政府与中国的共识，在台海问题上出现了三个“三级跳”改变，即行为上从言辞到文本而至行动，手段上从舆论到官方间接提起再到直接向中国提起，说法上从“希望和平”到“不希望战争”到“恫吓介入”等挑衅式策略。韩国认为，已经给了中国足够的空间与时间来适应这种改变，即从舆论的试探性放风指涉台海问题，再到与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宣言中或明或暗地指涉台海“不得改变现状”，再到直接向中国官方提出“不得武力改变或非和平手段解决”，不断越过底线，无视中韩共识。

(三) 南北关系对抗、对峙成主线

首先，韩国颠覆性重拾对朝围堵政策

尹锡悦政府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完全恢复，甚至远超李明博时代的对朝政策。尹锡悦上台后就颠覆过去与朝鲜的各种协议，起诉、处置了各类参与对朝和解的机构与人士，以朝鲜试射导弹为由废弃了与朝鲜的“919 平壤军事协议”，将文在寅时期为锁止朝鲜战争复发设置的门闩去除，打开了朝鲜战争随时恢复启动的制动阀。

随后，尹锡悦政府更是不断与朝鲜顶牛并相互刺激，将处于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的核问题彻底激化。朝鲜也由此放飞自我，解除了各类导弹试验的限制。为进一步刺激韩国，朝鲜甚至启动了过去冻结的开城工业园区。

在这种相互刺激下，尹锡悦政府更进一步重拾对朝鲜的单独制裁，与美国一起，相继对数十名朝鲜官员与机构采取了制裁措施，并重新将对朝机构彻底改造成涉朝人权机构，将朝鲜人权问题国际化，再次重走从政治根底和体制上颠覆朝鲜的老路。

其次，朝鲜的经济社会变化影响了其外交安全路线

封国数年，朝鲜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不但经济上严重退步，社会发展上也出现了诸多新问题。如何从经济上恢复与重振，实现新的进步成为朝鲜经济的重要话题。为此，金正恩委员长通过各式会议与动员，采取了各种积极的措施。朝鲜将重心放在了与中国的经贸联系上，先后采取了开关、货物通关便利化、人员通关协商等举措，其目的就是要抓住开关机遇，不断改善社会经济水平。

外交政策上，朝鲜采取的三段式外交风格。首先是通过各式导弹试验等军事措施，高调展示威慑能力的同时，不断或隐或明地介入俄乌冲突与巴以冲突，采取与韩国相似的路线，从外围撬动并威慑美韩日，还采取断然措施切断了与美韩的各种联系；其次是高调展示亲俄路线，不但首先承认了东乌两个独立共和国的地位，还通过与普京总统的会面及后续的各种宣示，来反制美韩；再者就是通过各种话术与行动来展示中朝传统关系，从中朝血盟联系、传统友谊等各个层面宣扬中朝关系的悠久历史传统。

军事上，朝鲜虽然身处不利环境，但还是尽最大程度地将核导能力全面展示，“核到顶、星能用、导达美”的三个战略目标明确、清晰。尤其是在对韩日的威慑能力上，更是精确无误地用各式各型导弹展示了精准性、覆盖面等战术能力。

事实上，朝鲜的经济、外交、军事目标是三个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三个维度，即军事威慑为背景、外交政策为手段、经济提升为目的，相互促进，即能获得核国家地位，又能实现经济目标的三位一体。

二、东北亚态势评估

由于国际形势与地区变局的迅速发展，东北亚态势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

（一）保守化、冷战化、阵营化困扰东北亚

东北亚地区政治与经济重回保守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经济与政治的恶性循环往往会导致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强硬，民族主义情绪的不断高涨。

经济低迷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东北亚区域的主流，进一步影响东北亚区域随之而来的各类选举，各种不确定性进一步放大。俄乌冲突的爆发，突显了对地缘和有限资源的无限争夺，不断引发了继之而起的各类冲突与矛盾，更对选举政治产生不利影响，经济与政治的可预见性严重下滑。

在美国的不断怂恿、韩日澳等国的有意助长下，各式冷战式“阵营化”被加固，东北亚局势更趋复杂化。美国编织了东亚版的北约——美日韩三边合作机制，更在实际中举行了多次、多手段、多兵种合成的军演，以期应对可能的台海局势，并试图将全球局势、东北亚态势与台海问题联动化，将韩日推向前台，以所谓近邻名义和不得寻求非和平方式的措辞介入台海。韩日在外交辞令上公然不断提及台海，更在人文、外交、政治、安全与情报等各种维度上重建、加强与台湾的联系，并公然宣称台海问题的“乌克兰化”。

（二）“助推、利用、企稳”的张力成为东北亚国家自处之道

东北亚地区“冷战思维”与“阵营化”的冲击力仍然强劲。美国在东北亚周边组建各类盟伴体系，如所谓“印太条约工作组”，声称中俄朝伊“破坏”东北亚与中东稳定，需要某种类似于北约的“集体安全组织”。同样，为对抗美日韩在东北亚形成的“南三角”网络，俄罗斯与朝鲜也会参与到搅局东北亚的大变局中，不但会加强对韩日的外交军事压力，也有助推“北三角”形成的冲动。

中美竞争以及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地缘问题影响的外溢范围与

速度在增大，俄、日、韩、朝等借局谋利的冲动超过以往。虽然中美在试图止住中美竞争不断下滑的趋势，企望稳步回升的预期在增加，但东北亚国家借机谋势的愿望与力量在增加。俄罗斯本因身处乱局，朝鲜常年深谙乱局处身之道，借势谋利是其天然反应。而韩日两国都试图利用中美矛盾而得到国力提升的战略机遇期。日本在谋求因内政外交问题的解脱之术，尤其是对和平宪法的突破良机，甚至梦想防卫出口能够放宽；韩国则半推半就，追随美国，通过贩卖军火得一时之利，在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甚至是未来可能的台海冲突中获得越战时的“军火机会”而再次腾飞。

（三）美日韩由伴而盟的北约化进程在完善

在美国的撮合、韩国的助推、日本的配合、朝鲜的刺激下，美日韩三边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美日韩不但实现了实质性的军事合作，更达成了在军事上谋求集体安全的“有事同盟”化。

首先，韩日打破了慰安妇、二战劳工问题的历史纠葛，实现了军事合作的互通兼容。美国着眼于在三国国内以国内法形式来推进该模式的固化，美日韩三边联合军演常态化，涵盖总统、安全首长、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四个层面实现了安全磋商常态化，包括建立三国军事后勤情报共享系统、加强三国军事安全一体化和互操作性、收集和应对机密和公开情报等。

其次是情报系统的联动化。美日韩三方探讨了建立类似“亚洲版五眼联盟”的情报安全问题，再加上韩日军事情报保密协定等的推进，以及日韩与北约情报组织的不断联动，情报组织的合作事实上已经在多数领域启动并联动。

第三是编织新的“南三角”合作网络。戴维营峰会之后，地区局势将迅速发生变化，美日韩安全经济技术合作将进一步深化，也意味

着美国将分别建立以北约为中心针对俄罗斯和以美日韩体系为中心针对中国的新的反俄反华包围网，成为构建针对朝鲜、中国、俄罗斯的新冷战对抗体系的转折点。

三、未来形势展望

2024年的东北亚仍然是以稳为主、变中趋稳的总态势。

美国是全球局势最大的影响者、搅局者与破坏者，严重压缩了中国的战略空间。在东北亚地区，美国试图通过美日韩三边合作体制困住中朝，并在东北亚、西太制造并利用新的冲突与麻烦。另一方面，美国也将尽量避免直接卷入冲突作为其策略之一。

从东北亚的具体问题来看，美国不希望被拖入诸如台海、朝鲜半岛等可能的冲突中去，尤其是当前全球两场冲突还未结束的情况下，引发另一场冲突进入“三线作战”的状态应该并非美国当前的战略目标。出于这一考虑，美国国内出现了将中美关系止住下滑、稳步回升的声音，加上选举的考虑，美国通过各界人士访华与加大对华接触，以资本为主的各方力量，以及美国的主流民意也都在开始考虑推动中美关系。

从东北亚的现实来看，俄朝都自视对抗美国的“一线”，美韩日的对抗性政策也会引发担忧，东北亚地区军事冲突风险呈上升态势。但很明显，俄罗斯经过俄乌冲突之后，仍然显现出牢固大国根基与战略纵深的底色，一改战争初期应对失据的窘迫，开始游刃有余地应对。同样，对于朝鲜而言亦如是，以引发战争的极端悬崖策略获取利益是根本，真正引发战争无疑并非其最终目的。

韩国与日本不断追随美国的外交安全政策也遇到了诸多的现实问题，尤其是经济层面，韩日都有被美国“越顶”无视的诸多案例，越

出美国对华政策的过激行为也遭遇到挫折，内政问题上的牵扯也削弱了这种过激外交的动力。

多个维度都显示，东北亚地区有着很多的负面消极因素，但不能否认存在着正面积积极要素。

10、总体向好、局部震荡的中国—东盟关系

赵卫华

复旦大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2023年是国际冲突加剧之年，在俄乌冲突之外，巴以又重燃战火，朝鲜半岛和印巴局势也持续紧张，而东南亚地区在各地冲突不断加剧的形势下却保持着总体平稳，绝大部分成员国社会稳定，经济向好，外贸持续增长，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亮点。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度尼西亚将2023年度东盟峰会主题定为“东盟要旨：增长的中心”可以说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东盟各国的有利态势。

2023年，也正值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和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十周年之际。十年来，中国和东盟共同努力，坚持独立自主与和平发展，不断克服各种困难和外部势力干扰，推动双方关系不断跃上新的台阶。作为新冠疫情结束后全面打开国门的第一年，中国和东盟各国已经站在了一个全新的历史起点上，总体而言，2023年双方的关系表现出如下两大突出特点：

一、总体向好，承上启下

在中美战略竞争持续的大背景下，尽管不断遭遇各种外部挑战，但中国与东盟关系总体保持着持续向好的局面，双方的政治互信进一步增强，务实合作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双方经贸在世界经济大环境不佳的情况下再创新高，文化交流在国门打开后也变得日益密切。

首先，在政治领域，无论是中国—东盟层面，还是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层面，双方均保持着密切的互动。2023年，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

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越南总理范明政、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泰国总理赛塔、柬埔寨首相洪马内和老挝国家主席通伦先后应邀访华。而中方则有国务院总理李强、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应邀出席东盟峰会、访问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越南之旅，中越双方就共同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共识，这是中国本年度最具突破意义的外交成果。虽然中越文本稍有差别，但越南以书面形式接受中越两国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共同体的表述，是越南与其他国家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度，远超其与美日等国的所谓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其次，双方的务实合作继续向着纵深方向发展，为国际社会互利共赢提供了范例。其一，由中国承建的雅万高铁正式通车，这是中国高铁走向世界的首张成功名片，也是中印两国共同推进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的成果典范，受到了佐科总统与印度尼西亚国内各界的高度评价，为两国今后的合作奠定了基础。其二，2023年4月，中老铁路客运列车正式开通；12月3日，“中老铁路+中欧班列”国际铁路运输大通道正式打通，不仅成功地将老挝从陆锁国变成了陆联国，而且中老铁路合作运营方式更是为资金缺乏国家的基础设施开发提供了典范。其三，2023年12月份，中越两国就推动中越跨境标准轨铁路联通与铁路建设达成了共识。其四，2023年5月，连接重庆-昆明-临沧-缅甸至印度洋的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式通车，标志着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务实合作向着纵深方向发展，进入了崭新的阶段。

第三，中国-东盟继续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双方贸易合作继续维持高位增长状态。中国长期维持东盟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而东盟则从2020年开始上升为了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自2020年至今，东盟已经连续四年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虽然受汇率变动和中美战

略博弈的影响，2023年度东盟与中国以美元计算的贸易总量可能难以超越2022年9753亿美元的峰值，但以人民币本币进行的贸易额依旧有所增长，中国几乎是所有东盟成员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重要资金来源。2023年，虽然美国加速实施“印太经济框架”，胁迫东盟诸国在生产链和供应链上对华去风险，但中国和东盟的务实合作却一直呈上升趋势。目前，中国是老挝和柬埔寨的最大投资者，是印尼和越南的第二和第四大外资来源。中方工业园区广泛分布在越南、泰国、老挝、印尼、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等国，双方合作范围涉及基础设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电子商务、矿产开采、机械制造、共享出行、互联网金融、信息通信和人工智能等各个领域，上述合作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反映了中国-东盟共同的利益需求，是任何外来压力都难以阻止的。

最后，中国和东盟各国的人文交流逐步恢复。中国和东盟隔海相望，山水相连，多年来双方守望相助，共克时艰，命运与共的意识不断深入人心，而人文交流恰恰是双方生生不息的精神纽带。随着新冠疫情的结束，2023年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人文交流逐渐恢复和展开，双方人员交往加速增长。截至12月底，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先后开放对中国游客限时免签或与中国互免签证；印尼、老挝、柬埔寨、文莱和东帝汶则允许中国公民办理落地签证，同时印尼也正在考虑对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另外，2023年，中国-东盟双方还达成共识，决定将2024年确定为“中国-东盟人文交流年”，充分显示了双方恢复人文交流的迫切期待。

二、局部震荡，瑕不掩瑜

首先，中菲关系出现震荡，成为中国-东盟关系中的不和谐音符。2023年，美国加速实施“印太战略”，企图拉拢越菲等国抗衡和遏制

中国。面对美国的威逼利诱，越南巧妙应对，坚持其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的外交战略，一方面因应美国要求将越美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同时又同意与中国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而菲律宾却在美国的鼓动和挑唆下，再次重蹈阿基诺三世期间的覆辙，充当了美国遏制中国的马前卒，站到了与中国对抗的最前沿。

小马科斯访华后不久，菲律宾政府再一次变脸，不仅在仁爱礁挑衅中国，更进一步强闯黄岩岛海域，在美国的支持下，恶意碰瓷，蓄意挑起对抗，企图操控国际舆论，达到片面改变南海现状的目的，从而使原本形势向好的中菲关系突然恶化，也使形势趋稳的南海地区重新成为各国关注的热点地区。在年末的东盟-日本特别首脑会议上，小马科斯企图挟持东盟各国反华，结果遭到东盟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抵制，充分说明个别国家借东盟对抗中国的企图行不通。

其次，缅甸内部乱局加剧，威胁到中国社会稳定和边疆安全。一是电信诈骗分子与缅甸各方势力勾结，以中国境内民众为主要目标展开电信诈骗活动，使国内民众深受其害，遭遇了巨额的财产损失。二是2023年10月以来果敢同盟军联合其他民族武装以清缴电信诈骗为名对依附缅军的地方军阀发动进攻，从而引发了缅军对民地武的新一轮进攻。在该轮冲突中，缅军不仅轰炸人口密集的居民区，还对被中国政府通缉的首要电信诈骗分子给予庇护。同时，缅甸军政府还企图引诱俄罗斯、印度等国介入，使局势复杂化；而大批流离失所的难民聚集在云南边境，对中国西南边疆地区的社会稳定和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面对上述形势，中国一方面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在边境地区组织预防性军事演习，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同时，坚决打击电信诈骗，将相关犯罪分子引渡回国受审。另一方面，中国坚持和平解决缅北问题的一贯立场，对缅军和民地武双方给予了积极斡旋，促使双方在昆明举行了和平谈判，同时也对难民给予了人道主义救济。

总之，2023 年是中国和东盟各国关系中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一年，双方关系在疫情后开局的第一年，尽管面临各种挑战和困难，依然取得了飞跃式的进步。虽然下半年发生了中菲南海对峙和缅北冲突升级等事件，但瑕不掩瑜，中国和东盟总体向好的趋势是难以阻挡的，随着中国和东盟将 2024 年确定为中国 - 东盟人文交流年，一个民心相通，关系更加密切的中国 - 东南亚关系未来可期。

11、相互依存、提质升级的中国—中东关系

孙德刚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2023年中东热点问题跌宕起伏，中国中东外交精彩纷呈。上半年，中国促成沙特与伊朗和解，推动中东“和解潮”，减少了中东信任赤字；下半年，巴以冲突愈演愈烈，引发“中东冲突潮”，中国推动停火止战，努力减少中东安全赤字。和解与冲突二元变奏下，中阿合作论坛提质升级，上合组织与金砖国家组织在中东实现“双扩员”。中国推动“全球三大倡议”，与中东国家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中国新发展为中东国家创造新机遇，努力减少中东发展赤字。

一、减少信任赤字：中国促成沙伊和解与中东“和解潮”的升温

2023年，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积极参与中东安全治理，为中东和平贡献力量。

中国是沙特和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国。2023年1-9月中国与沙特贸易额突破800亿美元，中国与伊朗贸易额突破达到108亿美元。

“一带一路”倡议与沙特“2030”愿景以及伊朗的“五年计划”相对接。中国是海湾地区利益攸关方，海湾地区热点问题不降温，冲突不解决，中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投资和贸易利益也会面临威胁。基于利益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理念，中国积极推动沙伊关系正常化。

中国是沙特和伊朗的经贸伙伴，也是双方可信赖的政治伙伴。在沙伊博弈过程中，美国力挺沙特，俄罗斯支持伊朗，中国呼吁双方求同化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在中东不寻求代理人，而是劝和促谈；

不搞势力范围，而是推动各国一起加入“一带一路”朋友圈；不谋求填补真空，而是编织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网络。中国在中东的“三不原则”，体现出中国“结伴不结盟”的外交理念。中国欢迎伊朗加入上合组织，支持伊朗和沙特同时加入金砖国家组织，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在沙伊之间劝和促谈的能力。

2023年发布的《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主张坚持合作之道，通过政治对话、和平谈判来实现安全；主张寻求可持续安全，通过发展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全的土壤。在沙伊冲突解决出路问题上，中国强调沙伊都是中东地区大国，两国和解有助于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和统一，也有助于全球南方的团结与统一。为此，中国提出了沙伊和解的五点倡议：相互尊重、公平正义、核不扩散、集体安全与发展合作。

元首外交在沙伊和解进程中发挥引领作用。2022年12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亲自做沙特工作；2023年2月，伊朗总统莱希访华并与习主席举行会谈，中国又做伊朗工作。中国与沙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升级，增强了两国对华信任。中国耐心开展外交斡旋，最终水到渠成，双方重归于好。3月，王毅外长、沙特国务大臣兼国家安全顾问艾班、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举行会谈，发表了《北京宣言》。中国的斡旋工作取得成功，不仅赢得联合国、阿盟、中东国家和全球南方的高度赞赏，而且受到西方国家的普遍欢迎。2023年12月，中沙伊三方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沙特外交副大臣胡莱吉、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巴盖里出席。王毅外长表示，中方愿以三方会议为契机，为实现沙伊睦邻友好注入新动力，为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作出新贡献。

中国促成沙伊复交，推动了中东地区“和解潮”。首先，埃及、阿联酋、巴林、苏丹等纷纷改善与伊朗关系，阿拉伯国家与伊朗整体关系回暖。其次，沙伊和解带动了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升温，

2023年土耳其与埃及、沙特和阿联酋等高层互访频繁。再次，以色列和土耳其关系改善，从对抗转向对话。最后，沙伊和解带动阿拉伯国家内部和解进程。2023年阿盟首脑会议在沙特吉达召开，叙利亚总统巴沙尔时隔12年重返阿盟峰会，亲伊朗力量与亲西方力量握手言和。

沙伊和解也促进了海湾国家战略互信。2023年6月，伊朗海军司令沙赫拉姆·伊拉尼提议，为确保海湾水域安全，伊朗计划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伊拉克、印度和巴基斯坦组建海军联盟。伊朗的这一倡议受到沙特等国的积极响应，海湾安全新架构蓄势待发。10月7日巴以冲突爆发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元首会聚利雅得，伊朗和沙特和解带动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团结。

二、减少安全赤字：中国力促巴以停火与中东“冲突潮”的降级

巴以问题是中东地区的核心问题，巴勒斯坦问题不解决，中东“和解潮”就会遭遇“寒流”。2023年10月，巴以双方爆发自1982年第五次中东战争以来最严重的流血冲突。针对西方大国在巴以冲突问题上治理能力不足，外交部于2023年11月发布《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提出了全面停火止战、切实保护平民、确保人道主义救援、加大外交斡旋、寻求政治解决等五项政策主张。中国呼吁安理会协商一致，召开国际和平会议，制定落实“两国方案”的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推动巴以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彰显了中国解决巴以问题的一系列理念。

首先是“以人为本”理念。2023年11月20日，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外长王毅集体会见由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率领的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联合代表团，约旦、埃及、巴勒斯坦、印尼外长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秘书长等出席。11月21日，习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巴以

问题特别视频峰会阐释了中国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一是冲突各方要立即停火止战，停止一切针对平民的暴力和袭击，释放被扣押平民；二是要向加沙民众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三是防止冲突扩大、影响整个中东。为缓解加沙人道主义局势，中国提供 200 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以及价值 1500 万元人民币的食品、药品等紧急物资。中国关于巴以停火止战、防止外溢的努力，预防了“冲突潮”的连锁反应。

其次是“公平正义”理念。2023 年 11 月 29 日，联合国举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纪念大会，习主席向大会致贺电并指出，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全力推动停火止战，保护平民安全，制止人道灾难。在此基础上，应尽快重启巴以和谈，尽早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加入联合国，既是巴方权利，也符合以色列的长远利益。

最后是“综合治理”理念。巴以问题盘根错节，既有历史遗留的问题，又打上了域外大国代理人战争的烙印。巴以都是冲突的受害者，持续冲突只会使双方陷入持久的安全困境。新形势下，中国主张国际社会应以巴以问题解决为契机，加强多边对话和磋商。11 月，中国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国，在有关各方之间积极斡旋，促成安理会通过了 2712 号决议，呼吁在整个加沙地带实行紧急人道主义暂停、建立人道主义走廊，这也是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安理会通过的第一份决议。

三、减少发展赤字：“一带一路”与中东“发展潮”的兴起

2023 年是“一带一路”提出十周年。中东各国与中国贸易互补性强，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天然伙伴。发展是中东各国的共同诉求和最大公分母。2022 年 12 月，首届中阿峰会在利雅得召开，双

方确定了务实合作的“八大共同行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阿围绕 200 多个大型项目开展务实合作，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沙特红海新城储能项目、阿尔及利亚东西高速公路、阿联酋艾尔达芙拉光伏电站等陆续竣工，中国电动公交车和新能源汽车打开了中东市场。2023 年 12 月，中国—阿拉伯国家银行联合体第二届理事会会议在埃及开罗召开。截至 2023 年底，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阿拉伯国家累计支持项目 99 个、发放贷款 171.89 亿美元。中国优势产能助力中东国家从传统能源到新能源、从传统基建到新基建、从传统经济到数字经济的现代化进程。

沙特是中国在中东最大的贸易伙伴国。2023 年 1-8 月中沙贸易额达 718 亿美元。10 月，第七届沙特“未来投资倡议”大会在利雅得召开，中资企业积极参与其中；12 月，中沙投资大会在北京举行，中沙企业签订了 60 余份合作协议。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和中东人口最多的国家，在“一带一路”中处于节点位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承建的埃及卫星总装集成测试中心完成验收；华为和中兴等移动网络公司为埃及信息化建设提供新技术。据中国驻埃及使馆提供的信息，2023 年 10 月，埃及成功在华发行 35 亿元的“熊猫债”，中国国开行向埃及央行提供 70 亿元贷款。中国国家电网承建的埃及电网升级改造项目、中国港湾承建的塞得港集装箱码头二期和苏赫纳集装箱码头二期项目、中铁二院承建的“斋月十日城”轻轨项目等都是“一带一路”旗舰项目。

以色列是中东创新强国，中以创新全面伙伴关系方兴未艾。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2023 年 1-8 月，中以贸易额为 160 亿美元，中国成为以色列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资企业积极参与以色列基建项目，海法新港、特拉维夫红线轻轨等已投入运营；中以常州创新园、上海普陀创新园进展顺利。2023 年是土耳其共和国成立 100 周年，“一带

一路”与土耳其“中间走廊”计划高度契合。2023年1-9月中土贸易额达335亿美元，同比增长15.6%。2023年，伊朗相继加入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组织，中伊务实合作拥有更多多边平台。2023年1-9月，中伊贸易额为108亿美元。

中国还为中东转型国家提供发展援助。2023年，阿尔及利亚总统特本、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访华，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和巨大市场为上述国家提供了发展机遇。12月，中国与约旦签订“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实现了“一带一路”在22个阿拉伯国家的全覆盖。

展望2024年，中东“和解潮”与“冲突潮”将相互交错，中东作为战略板块在中国外交全局中的地位上升。中阿合作论坛将迎来20周年，金砖国家组织将迎来埃及、沙特、伊朗和阿联酋四个中东新伙伴，中国式现代化将助力中东式现代化，推动中东“发展潮”。

12、非洲战略自主性提升的可持续性挑战

张 春

云南大学非洲研究中心研究员

冷战结束以来，非洲大陆和国家的战略自主性提升主要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即1991—2008年间因西方推卸责任而来的“非洲问题的非洲解决办法”阶段和2008—2022年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自主规划阶段，目前正进入第三个阶段即因应大国战略竞争、“全球南方”重要性上升而来的战略自主性可持续提升阶段，核心是强化战略自主性的内部基础；在此背景下，中非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益发重要。

一、“全球南方”崛起与非洲战略自主性的显著进展

进入2023年，“全球南方”迅速赢得国际战略和地缘政治重要性。作为“全球南方”国家最为集中的大陆，非洲再次成为大国战略竞争的前沿阵地。但与冷战时期的完全被动不同，今天的非洲把握机会的能力大为提升，战略自主性提升正进入“早期收获”阶段，主要体现为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代表性外交收获明显。2023年是非洲在国际体系中代表权明显增强的一年。8月22—24日，第15届金砖国家峰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峰会的重要成果之一是，将金砖国家成员从原来的5个增加至11个；在6个新成员中，非洲拥有2个，即埃及和埃塞俄比亚。金砖扩员被认为“全球南方”对现有国际体系发展的重要回应；这一发展也表明，源于多样性的共识性方法，而非西方的“赢者通吃”方法，将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关键手段。9月9日，在印度新德里举行

的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18次峰会上，非盟被接纳为G20正式成员，更代表着作为整体的非洲的国际代表权的重大提升。尽管也高度重要，但埃及于3月正式成为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成员并未引起国际社会充分关注。

第二，整体性外交得以推广。冷战结束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域外大国与非洲达成了诸多整体性合作框架，往往被称作“1+N”模式；其中，1指域外合作伙伴，N则是充满多样性的非洲大陆和国家。自2022年起，非洲大陆和国家从强化团结的角度，提出将“1+N”模式转变为“非洲+1”模式。这一模式转换有助于提升非洲对外战略自主性，因为非洲现在被视作一个整体，而不再是N所暗示的多样化甚至分裂。该模式首次被采纳是2022年12月的美非峰会，2023年在第二次俄非峰会和第一次沙特—非洲峰会中得以推广，凸显了非洲整体性外交的重要进展。

第三，独立性外交持续强化。“全球南方”概念的流行与2022年非洲在乌克兰危机中的独立自主外交密不可分。进入2023年后，非洲的独立自主外交进一步强化：6月中旬，由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和非盟轮值主席科摩罗总统阿扎利等非洲7国领导人组成的代表团赴俄罗斯和乌克兰，就乌克兰危机调停提出10点建议；而自10月巴以冲突爆发后，非洲国家明确反对以色列，南非和乍得等国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几近破裂；此外，非洲在安全合作上的独立性也明显提升，特别是2月举行的中国、俄罗斯、南非第二次海上联合演习。

第四，补偿性外交初获动力。整体而言，非洲往往是全球性问题的受害者而非肇事者。2022年，非洲借主办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7）之机推动“损失与损害基金”建立。在2023年的COP28上，非洲继续呼吁国际社会为损失与损害基金注资，推动气候变化的补偿外交尽快落实。类似地，尽管持续关注债务问题，但进入2023年后，

非洲国家整体上不再盲目接受西方的叙事逻辑，更多强调债务历史根源、非洲发展需求、公私债务平衡等。最为重要的是，在11月中旬的加纳阿克拉赔偿峰会上，非盟与加勒比共同体商议设立一个全球基金，为历史上深受西方奴隶贸易伤害的非洲人争取道歉和赔偿；而德国总统舒尔茨访问非洲期间的道歉，也暗示着非洲争取对奴隶贸易的历史性补偿的运动正拉开大幕。

二、发展分化与非洲战略自主性的脆弱基础

战略自主性提升的“早期收获”更多是非洲较为有效地利用外部环境变化的成果，必须辅以坚实的内部基础才可能转化为长期可持续收获。但疫后复苏相对缓慢、政治安全治理挑战严峻等，暗示着非洲战略自主性提升的基础仍相对脆弱。

第一，非洲地区 and 国家的疫后复苏远较其他地区和国家缓慢。根据联合国贸发组织（UNCTAD）的数据，非洲在2022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FDI）较2021年下降44%，而全球平均降幅为12%。得益于其丰富的关键矿产、庞大的年轻劳动力和强烈的发展意愿，2023年非洲吸引FDI可能比上年增长20%左右，但仍远低于2021年水平。当然，疫情冲击也刺激了非洲地区电商交易的持续发展，预期到2025年可达5.19亿美元，将比2021年增长约56%。此外，非洲也尝试抓住全球经济绿色转型所带来的重大机遇，以自身相对丰富的关键矿产为基础，重点发展电动汽车行业。这是经济学人智库（EIU）预期非洲经济将从2023年的2.6%增至2024年的3.2%的重要理由。

国别层次的发展同样喜忧参半，四大危机不同程度地困扰着不同国家。一是约有20个非洲国家面临较为严峻的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挑战，其中又以加纳、尼日利亚、苏丹、肯尼亚、津巴布韦、埃及等

国为最；二是债务危机仍在持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警告称非洲地区“债务脆弱性仍在上升”，而加纳、肯尼亚、刚果（金）、苏丹、乌干达、赞比亚、埃塞俄比亚等国负担相对更重；三是粮食危机，乌克兰危机、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及本土冲突使非洲近10亿人口无法负担健康饮食，多达3.42亿人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四是能源危机，其中又以一度使陷入灾难状态的南非电力危机为最。

第二，非洲政治治理呈大国巩固、小国恶化的分化态势。2023年，非洲大陆共计有8场重要的总统大选，其中尼日利亚、利比里亚、津巴布韦、埃及等大国均相对平稳，或以现任总统胜出，或是在野党胜出但权力交接平稳。相对而言，加蓬选举诱发了8月的政变，这与年初尼日尔的成功政变及年底几内亚比绍、塞拉利昂的政变传言等一道，推动了所谓“政变潮”在非洲特别是西部非洲的上升。需要指出的是，自2021年以来，非洲共计发生11次成功政变，对非盟和平安全治理能力、2017年启动的非盟机构改革以及非洲小国发展前景等均构成了重大质疑。

第三，内生性的安全陷阱与外生性的安全拥堵相结合，使非洲多个地区陷入长期且消极的安全复合体状态。一方面，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主义袭击呈明显缓解态势，但非洲却呈总体上升态势。非洲恐怖主义的跨境化特征日益明显，主要集中于西部非洲萨赫勒地区、中部与西部非洲接壤的乍得湖地区及东部非洲索马里—肯尼亚交界地区，其中萨赫勒地区的恐袭事件占整个非洲的约3/4。另一方面，非洲国家间和国内冲突呈升级态势。2023年4月，苏丹内战爆发，迄今已导致近1.3万人死亡，产生了约660万国际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而刚果（金）与卢旺达围绕M23运动的纠纷一度接近失控，已宣布自治的索马里兰因有3个州宣布回归索马里而爆发短暂但激烈的冲突，埃塞俄比亚民族联邦制的潜在风险仍不时转变

为真实的对抗。

三、中非合作与非洲战略自主性的可持续性

非洲“外交内行、内政外行”某种程度上与国际体系转型的“先立后破”态势相互交织：非洲被当作“立”未来国际体系的拉拢对象，但未来可能因此而陷入“破”或大国战略竞争陷阱，因为西方拉拢非洲的目的不是帮助非洲发展而是将其当成战略竞争工具。相比之下，中非合作正快速复苏，有助于真正夯实非洲战略自主性提升的可持续性基础。

第一，聚焦非盟《2063年议程》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非达成携手推进现代化事业的战略共识。致力于疫后共建更美好的未来，习近平主席在参加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与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共同主持中非领导人对话会，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携手推进现代化事业 共创中非美好未来》的主旨讲话。会议期间，中方还发布了《支持非洲工业化倡议》《中国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计划》《中非人才培养合作计划》等重要文件。中非领导人对话会的召开，正值非盟《2063年议程》第一个十年（2014—2023）执行规划即将到期、第二个十年（2024—2033）执行规划正在制定，联合国2030年议程中期评估等关键时刻。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事业的战略共识，有助于《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与非盟《2063年议程》第二个十年执行规划的有机对接，真正助力非洲可持续发展。

第二，着眼政治、经济、社会与环境等可持续发展，中非共同推动四大倡议的有效落实。以“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为核心的“中国倡议”，覆盖了经济增长、社会发展、政治安全和文明交流等国际关系核心领域，实现了大而优

的基础设施、小而美的民生促进、稳而安的安全保障及通而合的文明交流等的有机协调。进入 21 世纪以来，中国在非洲修建了超过 6000 公里铁路、6000 公里公路、近 20 个港口、80 多个大型电力设施，援建了 130 多个医院和诊所、170 多所学校、45 个体育场馆、500 多个农业项目。四大倡议的系统化与协同增效，将真正贡献于非洲战略自主性的内部基础。

第三，着力提升中国市场对非洲的主动和单边开放，中非合作真正展示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国际吸引力。自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以来，中国日益加大对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的主动和单边开放。上海进博会在为非洲企业和优质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支持和帮助方面，作出了大量创新性努力。而由湖南主办的中非经贸博览会则着力促进非洲的非资源类商品进入中国市场，2023 年的第三届中非经贸博览会共签约项目 120 个、金额 103 亿美元，发布对接项目 99 个、金额 87 亿美元。此外，自 2023 年 12 月 25 日起，中国开始对原产于安哥拉、冈比亚、刚果（金）、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塔尼亚等 6 个最不发达国家的 98% 税目产品实施零关税。2023 年 10 月，埃及获批在中东和北非发行规模达 35 亿人民币的首笔可持续发展熊猫债券，也是中国为缓解非洲资金瓶颈提供创新方案的重要标志。

13、拉美地区：政经困局犹存，对华合作提升

曹 廷

复旦大学拉丁美洲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2023 年拉美国家左右博弈加剧，经济增长放缓，社会问题持续累积。在国际局势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拉美国家作为南方不可或缺的力量，外交自主性加强。中拉合作在互利共赢基础上日益走深走实，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典范。

一、政经形势不乐观

在遭受疫情冲击后，拉美国家普遍陷入政治内斗加剧、经济增长低迷的困境。弥合政治分歧、提振经济发展成为拉美各国政府面临的重要任务。然而，大部分国家仍然无法跳出政治缠斗和经济不振的困境。

自 2022 年巴西、哥伦比亚、智利等国左翼力量赢得大选后，左翼政党在拉美占据大半壁江山。部分国家改革进程取得一定成绩。巴西卢拉政府推出经济改革措施和社会计划，加大对中下层民众扶持。墨西哥洛佩斯政府持续改革，在减贫、教育、医疗等领域取得积极成果。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与反对派就大选日期和选举监督等议题暂时达成和解。但左翼力量亦面临艰难转型。玻利维亚现任总统阿尔塞与前总统莫拉莱斯矛盾公开化，执政党“争取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分裂加剧。2023 年 12 月智利新宪法草案未通过公投，智利总统博里奇宣布任内不再修宪。同时，右翼力量亦在暗中积蓄力量、伺机东山再起。2023 年 11 月，阿根廷极端右翼人士米莱当选总统，给拉美左翼运动

带来一次重挫。2024年墨西哥、委内瑞拉等迎来大选，地区左右翼较量将再次呈现白热化。

受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各国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有限、政治内斗等因素影响，拉美地区经济增速有所放缓。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最新统计，2023年拉美经济预计增长1.7%，低于2022年的3.8%。墨西哥和中美洲国家增长3.5%，高于南美洲国家(1.5%)和加勒比地区(3.4%)。地区各国差异性较为明显。巴西和墨西哥增速均达3%，前者跻身成为全球第九大经济体，比2022年提升两个名次。阿根廷债务问题严峻，全年通货膨胀率高达161%。古巴国内通货膨胀、物资能源短缺严重。预计2024年拉美经济增速仅为1.9%。经济增长乏力使贫困状况难以改善。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预测，2023年该地区贫困率和极贫率分别为29.1%和11.4%，同比2022年(29%和11.2%)均有所上升。

二、外交独立意识增强

随着左翼力量纷纷掌权，拉美国家抱团取暖、联合自强的意识有所加强，一体化进程迎来新契机。2023年1月该地区最大的一体化组织——拉美暨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召开第七届领导人峰会，就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应对气候变化、粮食安全等议题达成共识。巴西总统卢拉宣告本国重新回归该组织，为拉共体的振兴注入强心剂。2023年5月，巴西、阿根廷、智利和哥伦比亚等国宣布正式回归南美洲国家联盟，并举行联盟峰会，就深化地区一体化达成共识。此外，南方共同市场实现扩员，接受玻利维亚为正式成员国，并与新加坡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但2023年底地区和平亦遭遇考验。委内瑞拉和圭亚那围绕埃塞奎博地区领土主权的争端有所激化，最终在地区大国和组织的斡

旋下走向和谈。

面对复杂激烈的大国博弈，大多数拉美国家坚持多元化外交政策。一方面，美国仍然是拉美国家的重要合作伙伴，部分拉美国家继续与美展开务实合作。2023年1月，拜登访问墨西哥并出席北美领导人峰会，墨总统洛佩斯呼吁美国加大对拉美的关注。11月，美国主办首届美洲经济繁荣伙伴关系（APEP）领导人峰会，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等拉美多国领导人出席会议，围绕供应链、移民和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合作。另一方面，拉美国家拒绝“唯美马首是瞻”，在诸多议题上与美分歧明显。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拉美多数国家表达了中立立场，拒绝追随美国谴责或制裁俄罗斯。2023年美国 and 德国高层先后访问拉美，劝说拉美国家为乌克兰提供俄制武器而遭拒绝。巴以冲突爆发后，大多数拉美国家对以色列的无差别攻击表示不满。玻利维亚率先宣布与以色列断交，成为该事件后第一个与以断交的国家。智利、哥伦比亚、洪都拉斯等国纷纷宣布召回驻以大使。

三、中拉关系进一步提质升级

2023年，中拉关系呈现出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发展态势，互利共赢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第一，政治互信持续加强。2023年，元首外交引领中拉关系行稳致远。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拉美多国领导人会见会谈、致电致函、在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舞台上密切互动。1月，应拉共体轮值主席国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邀请，习近平主席向峰会作视频致辞，体现了中方对中拉关系的高度重视。2023年，巴西、洪都拉斯、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圭亚那、乌拉圭、智利、阿根廷等国元首纷纷访华，推动与华关系取得新硕果。中国在拉美的“朋友圈”不断扩大。

2023年3月26日，中国与洪都拉斯正式建立外交关系。6月，洪都拉斯正式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拉美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由此增至22个。同时，中国与一些拉美国家关系不断升级。中国与委内瑞拉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乌拉圭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哥伦比亚、尼加拉瓜分别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此外，中国发生地震、洪水等自然灾害后，拉美国家第一时间向中方表达慰问；墨西哥遭遇飓风袭击后，中方积极向其提供物资援助，展现了中拉守望相助的情谊。

第二，经贸合作稳中向好。目前，中国是拉美第二大贸易伙伴国，拉美是中国对外投资第二大目的地。2023年1-11月中拉贸易额达到4464亿美元，前三季度中国对拉美进出口增长5.1%，高于中国外贸整体增速。中国已成为10余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分别与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与乌拉圭完成自贸协定可行性研究。中国对拉美投资金额和范围不断扩大。截至2022年底，中国对拉直接投资存量达5961.5亿美元。中国对拉投资不断多元化，从原材料领域扩展至电力、可再生能源、汽车制造业等其他行业。中企持续通过投融资、工程承包等多种形式参加拉美基础设施项目，参与了秘鲁钱凯港口、墨西哥玛雅铁路、哥伦比亚波哥大地铁、阿根廷胡胡伊省太阳能电站等重要项目建设。2023年底，中企参与建设的墨西哥玛雅铁路第一标段实现通车。金融合作开启新篇章。巴西和阿根廷分别与中国扩大货币互换协议。2023年3月，巴西中央银行宣布人民币已超过欧元成为该国第二大国际储备货币。

第三，科技合作方兴未艾。近年来，中国和拉美国家在技术合作方面不断取得新成就。2023年，中拉技术转移中心在广东成立，标志着中拉技术转移从合作共识迈向实际行动。巴西总统卢拉访华期间，中巴决定加强电子商务、低碳经济、数字经济和信息通信技术等领域

域合作，建立联合研究、开发和创新中心。中国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和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市政府合资成立哥伦比亚第一座疫苗工厂。中国与阿根廷在农业创新、卫星导航系统等领域持续展开交流合作。

第四，互学互鉴与人文交流持续深化。2023年多位拉美国家领导人访华，除了访问北京之外，还选择了上海、深圳、成都等城市进行考察，以更全面了解中国经济面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访华首站选择了深圳，表示希望更多借鉴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的成功经验。洪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强调其访华不是为了寻求援助，而是寻求可持续发展。民间交往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中国在巴西巴伊亚联邦大学新开设孔子学院，为更多巴西民众提供了解中国语言文化的窗口。

“未来之桥”中拉青年领导人培训交流营成功举办，为中拉年轻一代架起友谊之桥。来自拉美16国的19位媒体代表赴华进行深度报道。古巴拉美社与中国多家媒体签署合作备忘录。

第五，在国际事务中，中拉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和冷战思维，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中方和巴西卢拉政府就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沟通，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密切协调，在安理会框架下推动局势缓和。同为全球南方成员，中拉在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应对气候变化等多边议程上不断加强共识、密切配合。中方倡导的“三大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受到拉美国家认同。古巴接任“77国集团+中国”轮值主席国并在首都哈瓦那举办峰会。2024年，巴西和秘鲁将分别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和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届时，中国和拉美国家将在国际舞台上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和协调，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更大正能量。

14、俄乌冲突又一年：僵局与出路

韦宗友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二个年头，双方依旧刀光剑影，在战场上进行着激烈角逐，和平的曙光依然遥不可及。这一年，乌克兰在乌东和乌南三条战线上，对俄罗斯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攻，尽管给俄罗斯造成一定军事与政治压力，甚至引发了瓦格纳兵变，但并未能实现预期，收复大片被占领土，相反战场陷入令人不安的僵局。随着战争陷入消耗战与拉锯战，无论是乌克兰内部还是西方，都不同程度上出现了战争疲态，美欧内部在援乌问题上甚至出现了裂痕。俄乌冲突何去何从，将成为 2024 年又一个充满悬念和不确定的热点事件。

一、乌克兰大反攻与战场僵局

乌克兰在 2022 年夏季后的反攻中大获成功，收复了超过 8000 平方英里的失地，一度令乌克兰和西方信心满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2023 年 2 月俄乌冲突爆发一周年之际发表的演说中，甚至将 2023 年视为乌克兰的“胜利年”。从 2022 年底，美国领导的北约就与乌克兰军方进行反复磋商，并进行了多次兵棋推演，决定在 2023 年春季乌克兰举行大规模反攻，收复被占领土。

然而，计划不如变化。首先，乌克兰未能如美国军方所愿在 2023 年 3 月迅速举行军事大反攻，相反一直拖到 6 月才发起反攻行动。按照事后美国军方的总结，这让俄罗斯军方获得重大“喘息时机”，可以从容不迫在前线构筑战壕、反坦克装置、地雷及立体火力网，令乌

克兰的进攻大大受挫。

其次，乌克兰的军事大反攻并没有按照美国军方希望的那样，集中优势兵力直捣南部的梅利托波尔，斩断俄罗斯在乌克兰南部的“大陆桥”。乌克兰将兵力分散成三支力量，沿着长达 600 英里的战线上，分别朝着东部的巴赫穆特和南部的梅利托波尔和别尔江斯克进攻。战线拉长、兵力分散，导致乌克兰军方无法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取得突破。

最后，乌克兰军事大反攻遭遇俄罗斯军队“出乎意料”的顽强抵抗。俄罗斯军队凭借坚固工事、密集火力网以及大量无人机袭扰，让乌克兰在三条战线上的进攻都严重受阻，遭受巨大装备和人员损失，战争演变成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特别是东部巴赫穆特的数月消耗战，牵制了乌克兰大量精锐力量。乌克兰除了在南部战线上取得少量军事胜利外，未能根本改变战场形势。自大反攻以来，乌克兰仅收复了 200 平方英里的土地，这与 2022 年收复 8600 多平方英里土地的战果形成了鲜明对照。俄乌冲突在战场上陷入了令人不安的僵局状态。

二、战争疲惫与西方援乌裂痕

冲突久拖不决，战场形势陷入胶着，巨大的装备和人员损耗，让乌克兰和西方都面临巨大压力。美国军方保守估计，冲突爆发以来，乌克兰部队的伤亡人数接近 20 万，其中至少有 7 万人丧生。此外，由于战争，大量乌克兰人流离失所，逃往欧洲和其他国家的难民超过 600 万。这对于一个仅有 3000 多万人口的国家来说，无疑是无法承受之重。为了弥补战场损失和维系军事反攻行动，2023 年 12 月初，乌克兰军方一度提出再次征召 50 万人。泽连斯基因担心国内反对，表示会全面研究形势再做决定，暂时不会大规模征召新兵。

在经济方面，乌克兰也面临艰难局面。在俄乌冲突的第一年里，乌克兰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毁于战火，出现该国建国以来最大经济衰退。尽管 2023 年乌克兰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是依然严重依靠来自欧美的外部经济援助来维持政府运转和推进军事行动。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了 300 多亿美元经济援助以及人道主义援助，欧盟则向乌克兰提供了超过 300 亿欧元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没有这些外部援助，乌克兰政府连维持起码的政府运行都难以继，更不要说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了。

战场上的困顿，经济上的巨大压力，也让乌克兰民众产生了“战争疲惫”。民调显示，泽连斯基的支持率已经由一年前的 84% 下降到 2023 年 12 月初的 62%。这对于一个“战争总统”来说，无疑不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数字。

更令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军方担心的，是美国及北约欧洲盟友对乌克兰援助可能出现的变数。首先，北约对乌克兰军方在大反攻中的表现，十分不满。早在 2023 年夏天乌克兰大反攻受挫时，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勒及北约秘书长斯滕尔伯格，就对乌克兰军方未能按照北约希望的时间、地点及方式展开军事反攻，表达过不满，认为乌克兰军方过于保守，过于强调北约提供更多先进武器装备而不是积极开展军事行动，贻误了战机。

其次，美国国内对持续“无条件”援助乌克兰的热情大为下降。美国盖洛普 2023 年 12 月的民调显示，在俄乌冲突即将进入两周年之际，有 31%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为乌克兰提供了太多的援助，其中高达 48% 的共和党选民认为提供的援助太多，凸显美国人对继续援助乌克兰的质疑乃至反对。

在美国国会，拜登政府提出的高达 500 多亿美元的乌克兰援助法案，也多次遭到共和党保守派的反对。尽管大部分共和党议员声称，

并不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本身，但是要求必须加强对军事援助的监管，不能给乌克兰政府“开空白支票”，同时要让欧洲等其他西方国家承担更多援乌责任。不仅如此，他们还将拜登政府提出的援乌法案与美国国内的边境管控问题捆绑起来，将其变成要挟拜登政府的政治砝码。可以想见，随着美国明年进入大选周期，乌克兰未来获得美国军事经济援助的阻力将会越来越大，数量也会越来越受限。

最后，欧盟在援乌问题上，也面临来自内部的反对。俄乌冲突以来，欧盟与美国一道，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援助，特别是经济和人道主义救助。随着美国在援乌问题上面临日益上升的国内压力，美国希望欧盟及北约欧洲成员国承担更多援乌责任。然而，俄乌冲突久拖不决、欧盟通胀压力和能源价格上升，导致欧盟内部、特别是匈牙利等国开始公开质疑甚至反对持续援助乌克兰。即便是一向坚定支持的波兰，也因国内民众不满向乌克兰开放边境导致的经济问题，与乌克兰关系出现了某种裂痕。2023年12月15日，在欧盟投票表决未来四年向乌克兰提供500亿欧元援助问题上，匈牙利总理奥尔班投下了否决票，让欧盟援乌面临巨大不确定性。尽管欧盟表示会在2024年初就此再次举行磋商，但这一插曲至少显示，欧盟的“战争疲惫”显著增大，在援乌问题上的裂痕正在加深，前景不明。

三、俄乌冲突前景：战与和？

2023年下半年以来，美国战略界支持政治解决俄乌冲突、要求尽快停火的声音显著增加。他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尽管俄罗斯战场上表现拉胯，但是俄罗斯也在迅速适应、学习信息化、智能化条件下的新战争形态，特别是开始大规模使用无人机改变战场态势。而且，俄罗斯毕竟是个核大国和传统军事大国，乌克兰不可能指望在战场上打败

俄罗斯让俄罗斯“屈服”。因此，对于乌克兰来说，最好的结果，就是通过政治谈判，达成停火，尽快结束俄乌冲突，避免更多生灵涂炭，甚至将西方卷入到与俄罗斯的冲突中去。

不过，目前来看，无论是乌克兰、美国还是欧盟，似乎都没有准备好通过和谈，结束冲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 2023 年年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与俄罗斯和谈“当前并不可行”，强调他将致力于“恢复乌克兰全部国际承认的边界，包括克里米亚。”拜登 2023 年底在白宫与泽连斯基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称，“我们希望看到乌克兰赢得战争，……意味着乌克兰是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能够在今天捍卫自身，并能够阻止未来的侵略。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欧盟主席冯德莱恩 2023 年底在欧洲议会上表示，“只要战争持续下去，我们必须……要多久就支持乌克兰多久。”

此外，普京也没有尽快和谈的打算。他在 2023 年年终记者招待会上说，“当我们实现我们的目标，（乌克兰）将会有和平”。换言之，普京依然要在乌克兰实现“去纳粹化、去军事化及中立地位”的目标。

各方都似乎有不愿意尽快和谈的“充足”理由。乌克兰不愿意失去被占领土，俄罗斯不愿意半途而废，美国和欧盟不愿意承担“背信弃义”的骂名。而且，俄罗斯相信，时间在它一边；乌克兰相信，只要西方给予源源不断的援助，时间也在它一边；美国和欧盟认为，再有一场决定性的战场胜利，或许可以等到俄罗斯失败的那一天。

在冲突双方都缺乏和谈意愿，美欧不愿意承担“背信弃义”骂名情况下，俄乌冲突在 2024 年将会继续恶化，可能迎来更为激烈、后果难料的战场争夺。或许，到冲突双方都筋疲力尽了，或一方真的在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抑或美欧在各自内部或在国际社会更大压力下被迫进行强有力的外交斡旋，俄乌冲突才能迎来新的曙光，战场上的血雨腥风让位于谈判桌上的折冲樽俎。

15、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影响与前景

邹志强

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研究员

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至12月底仍未结束，已造成双方超过2万人死亡，加沙地区200多万人几乎全部处于流离失所状态，带来严重的人道灾难。激烈的武装冲突吸引了各方注意力，围绕巴以冲突的争议也集中迸发出来，已成为影响地区格局走向和大国中东政策的重要因素。

一、巴以冲突背景下的各方政策立场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主要是出于阻止更多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和解、反击以色列对巴领土的蚕食、争取巴国内政治支持和带动巴勒斯坦人大起义等，进而避免巴勒斯坦问题的进一步边缘化。巴勒斯坦问题长期无法解决，巴以和平遥遥无期，巴勒斯坦人日益绝望，这是冲突的根本原因。此次巴以冲突再次将巴勒斯坦问题推到世人面前，相关国家不得不对此做出必要反应并根据形势变化进行政策调整。

阿拉伯国家态度复杂，既强烈反对和谴责以色列，又难以做出实质性反制，且各国态度差异明显。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中，约旦、巴林选择召回大使和外交降级，而埃及、阿联酋、摩洛哥态度相对温和，除了立场宣示之外并无实质性动作，政府与民间对以态度的张力空前增大。11月11日，沙特主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特别峰会，与会各国共同发声谴责以色列，展现出团结姿态。同时，阿拉伯国家

希望通过斡旋结束冲突，埃及、约旦、卡塔尔等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东地区的两个非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对以色列立场强硬，多次强烈谴责以“战争罪行”。伊朗不愿意看到更多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改善关系，特别是沙特与以色列建交，高调反对以色列，多次呼吁所有伊斯兰国家与以色列断交。土耳其从开始的谨慎平衡立场与试图从中斡旋的政策，转向激烈反以，埃尔多安公开为哈马斯辩护并召回大使，强烈谴责以色列，试图扛起道义大旗。

美国在冲突初期对以色列进行了政治、外交与军事的全方位支持，后来逐步考虑限制以色列的过火行动。美国在中东长期拉偏架，此次冲突爆发后拜登政府依然明确站在以色列一边，派遣两艘航母到东地中海、紧急扩大对以武器与资金援助，实质是火上浇油，激化了中东国家的反美情绪。在联合国，美国以“以色列拥有自卫权”为由，多次否决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导致安理会机制陷入瘫痪状态。然而，美国不愿陷入另一场地区战争，加之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巨大人道灾难，国内国际批评声浪增大，美国政策出现调整趋势，开始限制以色列军事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11 月 30 日再次访以时表示，美方反对造成平民大规模伤亡，要求以方在军事行动中更为“精准”。12 月 12 日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以色列对加沙的无差别轰炸正使其失去支持，对以发出了严厉批评。12 月 15 日，美国总统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访以，表示新阶段的重点是精准打击哈马斯，改变密集轰炸和地面进攻的方式。

欧洲国家在冲突爆发后跟随美国站队以色列，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和打击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德国、英国、意大利、荷兰、法国等国和欧盟领导人先后访问以色列。但随着冲突升级和人道主义灾难的扩大，欧洲国家之间的分歧、政府与民间立场的差异日益凸显，遭遇社会撕裂与动荡风险。欧洲国家逐步调整了政策立场，强调以色列的军

事行动“必须符合国际人道法和战争法”，进行人道主义救援，寻求尽快结束冲突。

俄罗斯将巴以冲突作为对美欧博弈的杠杆。10月26日俄罗斯在敏感时刻接待了哈马斯代表团的访问；12月6日普京突访阿联酋与沙特，讨论国际能源市场和巴以冲突；12月7日伊朗总统莱希访俄，讨论中东形势。12月10日普京又突然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说明俄罗斯也在适时调整政策，寻求介入巴以问题。

二、巴以冲突的主要影响

此次巴以冲突很大程度上重塑了巴以关系，并在地区内外产生了多方面外溢效应，影响中东地区格局的演变与大国战略调整进程。

第一，巴以问题重回中东地缘政治的前台，巴以关系进入重塑期。巴以双方是此次冲突的最大受害者，以色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导致巴勒斯坦损失惨重，引发严重的人道灾难；以色列也因此陷入外交孤立，加沙有可能成为以色列的泥潭，内政外交走向都将受到此次冲突的显著影响。同时，此次冲突再次反映了巴以问题的全局性影响力，巴勒斯坦问题长期被边缘化的局面有所改观。以色列企图搁置甚至取消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直接与阿拉伯国家和解的设想遭受挫败，国际社会更加认识到，巴以问题不解决，阿以和解与和平就缺乏根基，巴勒斯坦问题因而受到更大重视。

第二，巴以冲突影响中东地区格局的演变。首先，以色列不仅在军事上遭到近50年来最为严重的一次打击，也重陷地区孤立。此次冲突中断了以色列与沙特的和解进程，阿拉伯国家、伊朗、土耳其等主要地区力量与以色列的矛盾增大，关系倒退或恶化。其次，巴以冲突促进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团结，成为推动中东地区和解潮的新

动力。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特别峰会的召开，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外长联合代表团的全球出访，沙特与伊朗的持续互动与合作意愿的增强都是突出表现。最后，伊朗借巴以冲突打断沙以和解进程，也打破了美以联合阿拉伯国家建立反伊朗统一战线的计划，黎巴嫩真主党、叙利亚和伊拉克民兵武装、也门胡塞武装等“什叶派抵抗阵营”力量更趋活跃。12月以来，胡塞武装在红海南部海域频繁袭击过往船只，美国联合盟友组建“红海护航联盟”，这加剧了地区局势紧张。

第三，巴以冲突产生了全球性外溢效应。一方面，此次巴以冲突搅动了全球舆论场，西方国家因其内部不同群体的立场冲突引发抗议示威、政治撕裂、族群矛盾等政治与社会问题。欧美多国发生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示威，政府亲以与民间反以立场相悖，社会动荡压力下不得不谨慎地调整政策。另一方面，巴以冲突与俄乌冲突、伊朗核问题、也门问题等其他国际热点问题呈现出明显的关联效应。巴以冲突背景下，西方国家因紧急加大对以色列的支持而影响到对乌克兰的军事与经济援助，伊朗和胡塞武装与以色列之间的对抗升级，相关地区问题解决难度增大。

第四，巴以冲突影响到大国战略调整进程。美国“先沙以、再巴以”的中东和平计划落空，联合阿以遏制伊朗、聚焦大国战略竞争的节奏被打乱，其全球战略优先方向受到影响，短期内不得不加大在中东的军事、政治和外交投入。俄罗斯借助巴以冲突缓解了在乌克兰方向的战略压力，并通过能源合作和地缘政治两大抓手适时加大对中东的介入，彰显地区存在感与试图重塑影响力。

三、巴以冲突的前景展望

首先，此次巴以冲突规模大，但博弈有限度。初期外界最为担心

的冲突升级为大规模地区战争（所谓“第六次中东战争”）并没有成为现实，此次冲突的主体仍然是以色列与哈马斯，阿拉伯伊斯兰国家普遍反对以色列、支持哈马斯，但仅限于道义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真主旅等武装组织有限介入，但是美伊、伊以之间没有直接冲突，也没有决心摊牌，各方保持了博弈限度。此次冲突没有打破既有地区格局，各方力量对比和关系现状没有根本改变。

其次，冲突还将持续较长时间，但停火止战是大势所趋。短期内以色列还不愿停手，彻底停火仍有困难，但国际社会在努力劝和促谈，和谈有望继续。未来冲突将如何收场以及加沙治理方案仍不确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色列不断调整的军事目标。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从原来的“三步走”进入了“新阶段”，但难以实现其彻底消灭哈马斯的目标。12月中旬，以色列安全部门提议冲突结束后由美欧国家组成多国部队接管加沙，发出了妥协的信号。未来哈马斯有生力量基本被以色列消灭后，有可能转向地下斗争，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袭击风险或许将有所上升。

再次，阿以和解进程陷入僵局，但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和解仍将持续。一方面，沙以和解进程中断，以色列周边地缘环境恶化，“阿拉伯之春”以来以色列相对有利的地缘战略环境不复存在，重新成为地区矛盾的焦点。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内部的矛盾与争夺显著平息，民间反以浪潮上升，各国政府不得不谨慎对待与以色列的关系。另一方面，沙特与伊朗继续和解势头，11月11日，伊朗总统赴沙特参与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特别峰会，之后两国防务部门通话商谈军事合作；12月15日，中、沙、伊在北京召开三方联合委员会首次会议。除以色列之外，其他各方之间的和解仍在持续，中东和解潮按下暂停键而不是停止键。

最后，巴以和谈难度增大，但国际共识明显扩大，国际合作更为

关键。此次冲突造成巴以双方严重伤亡和激烈对抗，巴以政局都面临较大变数，巴以和谈在短期内更加困难。但冲突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巴勒斯坦问题的边缘化趋势，反映了其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地位与全局性影响力。未来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更加有赖于国际合作与大国协调。在新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包括美国都更加认识到以“两国方案”为基础解决巴以冲突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也可能成为国际合作推动落实“两国方案”的新契机。冲突爆发后，中国积极开展外交斡旋，推动停火止战和开展人道主义救援，强调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落实“两国方案”，并于11月30日及时发布了《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中国的立场与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与支持。



復旦大學
FUDAN UNIVERSITY

